臺大歷史學報第 72 期
2023 年 12 月，頁 235–292

BIBLID1012-8514(2023)72pp.235–292
2022.4.15 收稿，2023.5.2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12_(72).0004

吉朋與註腳的藝術

楊　肅　献*

提　要

這篇論文以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羅馬帝國衰亡史》（以下簡稱《衰亡史》）前三卷之註腳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吉朋如何使用註腳，藉以了解吉朋書寫《衰亡史》背後的史學思維。吉朋在《衰亡史》中大量使用「註腳」，將近八千個，支撐其羅馬帝國史的宏觀敘述。這些註腳的內容多元，文字豐富，佔《衰亡史》篇幅近四分之一。吉朋使用註腳的手法高明，將其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除了基本的史學徵信功能，吉朋在註腳說明資料選擇原則、處理方式，或進行考訂與論證。有些情境不便在正文表述，吉朋選擇在註腳中揭露，兼顧歷史真實與敘事的文雅。他也利用註腳與古人對話，與近人論辯，進行今古比較，猶如一個桌上論壇。由此可知，吉朋的註腳隱藏他的許多歷史思維。

關鍵詞：吉朋　註腳　《羅馬帝國衰亡史》　十八世紀　歷史書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angsh@nt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說明史源採用原則
二、討論史料處理手法
三、歷史考訂與解釋
四、間接顯示書寫筆法
五、史家的臧否
結 語

前 言

《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以下簡稱《衰亡史》) 第 18 章敘述西元 4 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 r. 306–337) 的哥德戰爭 (Gothic War, 331) 與撒馬息安戰爭 (Sarmatian War, 334)。在敘事過程中,作者艾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 1737–1794) 在一個註腳中說明史源引用情況:「哥德戰爭和撒馬息安戰爭的既有敘事,極其破碎且不完整,我不得不比較下列作者。」[1]他臚列他參照的史源:

> 阿米亞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330–c. 391–400)《羅馬史》(*Rerum gestarum*)、《瓦列西亞努斯羅馬史彙篇》(*Anonymus Valesianus*)、尤卓比烏斯 (Eutropius, fl. 363–387)《羅馬史簡篇》(*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盧福斯 (Sextus Rufus, ?–380)《羅馬簡史》(*de Provinciis*)、朱里安 (Julian, 331/332–363)《演說集》(*Orationes*)、史班漢 (Ezekiel, Freiherr von Spanheim, 1629–1710)《朱里安皇帝凱撒傳評註》(*Commentary*)、聖日羅莫 (Jerome;

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2 (London: Methuen & Co, 1905), p. 220, n. 47. 以下簡稱本書為 *Decline and Fall*,引文中譯由筆者自譯。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atin: 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 c. 342–347 –420）《年鑑》（*Chronicron*）、優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 c. 260–265 –339）《君士坦丁傳》（*Vita Constantini*）、蘇克拉提斯（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 c. 380–439）《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蘇佐門（Sozomen, c. 380–450）《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卓西莫斯（Zosimus, fl. 490s–510s）《新羅馬史》（*Historia Nova*）、周南德斯（Jornandes）《哥德人史》（*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伊西多魯斯（Isidorus of Seville, c. 560–636）《大年鑑》（*Chronia Maiora*）和《哥德族史》（*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 Vandalorum et Suevorum*）、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905–959）《帝國行政論》（*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這 13 位作者都述及兩場戰爭，雖各有所偏，卻可「相互補充、校正和闡明」。吉朋花了功夫將 14 種敘述整合成一個一致、合理的敘事。他對自己敘事的「精確」充滿自信，放話「讀者若願不辭相同的辛勞，可以有權來驗證我的敘述」。[2]這是個典型的吉朋式註腳，完整交代他的敘事根據，也展現了個人的學術自信。

一般的讀者自然不會逐一查證吉朋的敘事，卻真有人出之好奇，動手比對他的引證。蘇格蘭歷史家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閱讀剛出版的《衰亡史》第 1 卷，稱讚其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史作。不過，羅伯森自承身為史家的經驗「教導我去懷疑史家同僚的精確性」，遂不嫌麻煩，核對吉朋的引證資料：「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無人當得歷史家之名。……我核對過多處引文，……發現他引用的段落，無一不是他親眼查閱過的。」[3]羅伯森對吉朋歷史書寫的精確讚嘆不已！實際上，吉朋對自己勤查史源甚感自豪，在第 56 章的註腳表白：「我的長年讀者會相信我說的，我自己經常上溯到源頭，只要這樣的上溯有用

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20, n. 47.

3 Edward Gibbon,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Robertson to Mr. Strahan. 15/3/1776," in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vol. 2 (London: John Murry, 1814), pp. 159–16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可能。我勤於翻查原文。」[4]《衰亡史》後三卷出版後，劍橋大學古典學者理查・波爾森（Richard Porson, 1759–1808）也遍查拜占庭史家的著作，試圖找出吉朋是否有引證錯誤之處，驚訝地發現居然一個也沒有找著。[5]

羅伯森和波爾森何以能夠驗證《衰亡史》的引證？這是因為吉朋在書寫時，每一敘事都引證了史源，並下「註腳」註明出處，供讀者徵信。《衰亡史》全書共 71 章，除了第 48 章，其他各章都掛滿了註腳。[6]吉朋對歷史書寫精確性的要求與執著可見一斑。

《衰亡史》第 29 章引用法國學者雷納爾（Abbe Raynal, 1713–1796）《兩印度之哲學的與政治的歷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deux Indes*）。吉朋讚美這本書精妙有趣，但對其敘事不註引據頗有微詞，在註腳中批評道：「全然欠缺引證，是這本有趣史作不可原諒的缺陷。」[7]《衰亡史》第 20 章也批評荷蘭古典學者托利烏斯（Jacob Tollius, 1633–1696）的類似缺點。法國學者布瓦羅（Nicolas Boileau-Despreaux, 1636–1711）將羅馬時代評論家龍津納斯（Longinus）的《論崇高》（*On the Sublime*）譯成法文，托利烏斯為之寫序，文中提到希臘化安提哥那王國安提哥那一世（Antigonus I, 382–301 BCE）在一次作戰時見到「異象」：安提哥那向部隊保證，他看到一個五角形符號（象徵安全），上有「在這次征服中」字樣。對此，吉朋在註腳中揶揄，

> 不過，托利烏斯最無法辯解的是忘記提出憑據；而他的聲名，無論文學或道德上，也非全無瑕疵。[8]

有關這一奇蹟，吉朋指出，古代學者迪歐多魯斯（Diodorus Siculus, 西

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6, p. 167, n. 1.

5 轉見 G. M. Young, *Gibb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48), p. 117.

6 第 48 章的內容是說明《衰亡史》最後兩卷（卷 5 與卷 6）的撰寫計畫，並概述預定內容大要，沒有引證的必要，故未使用註腳。

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12, n. 74.

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02, n. 4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前 1 世紀）、普魯塔克（Plutarch, c. 46–120）和查士丁（Marcus Justinus, 約 2 世紀）「都保持沉默」；西元 2 世紀馬其頓學者坡里葉努斯（Polyaenus, 西元 2 世紀）《戰略》（*Stratagemata*）一書收集安提哥那 19 種戰略，唯獨「全然不知有此非尋常異象」。[9]吉朋以古代作者對此事的沉默，甚至熟悉安提哥那戰略的馬其頓學者都未提及，迂迴嘲諷作為近代學者的托利烏斯可能「編造」事實。

蘇格蘭歷史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閱讀剛出版的《衰亡史》，深感喜愛，並樂見其成功。不過，他對這部書提了幾項格式編排建議，包括頁邊上沿標示章號、頁邊註明內容綱要，更重要的是註釋的編排方式：

> 這部書編排引註的方式真是折磨讀者。每當被告知有一個引註，你就得翻到卷尾查閱：等翻閱到卷尾時，你卻又常只看到註明資料出處而已。這些資料出處的指引，應當只需要印在頁邊或者頁底即可。[10]

休姆從讀者角度，建議吉朋應調整「註釋」編排方式，以利查證。吉朋從善如流，在《衰亡史》後續出版時，作了調整。

《衰亡史》全書六卷，共下了 7,719 個註腳，構成吉朋羅馬帝國史宏觀敘述的基礎。吉朋的註腳不但數量驚人，內容更為豐富：根據估算，《衰亡史》一書的註腳文字約佔全書篇幅的四分之一。[11]吉朋的註腳並非只是單純標註資料出處，他發揮了註腳的多元功能：說明史料採用原則、解釋證據處理過程、展示歷史書寫筆法、與古今學者對話，以及對古今史家的臧否等等。美國的古代史學者包爾碩克（G. W. Bowersock）覺得吉朋有意將註腳寫成一種「副文本」（subtext），依附於正文之下，

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03, n. 42.

10 David Hume, “To William Strahan,” in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vol. 2, ed. J. Y. T. Grei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p. 313.

11 David P. Jordan, “LeNain de Tillemont: Gibbon’s ‘sure-footed mule’,” *Church History* 39, no. 4 (December 1970, New Haven), p. 48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又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書寫時可不必如正文那般中規中矩，而讓作者可以比較自由、無拘束地表達個人的觀點、批評或態度。[12]由於這樣的特質，為吉朋作傳的大衛・勞（D. M. Low, 1890–1972）將這些註腳比擬為吉朋的「桌邊談話」（table talk）；[13]藉這些談話，史家約爾丹（D. P. Jordan）說，吉朋在與自己、讀者和史源對話。[14]在約爾丹眼中，吉朋的註腳猶如一種「高雅的呼告（Apostrophe），召喚出支撐《衰亡史》書寫的古典學術」。[15]在吉朋手中，註腳的功能發揮到極致，幾近於一種「藝術」。

本篇論文以《衰亡史》前三卷的註腳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吉朋如何使用註腳，藉以了解吉朋書寫《衰亡史》背後的史學思維。《衰亡史》前三卷敘述西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總共 38 章，構成一個完整單元。[16]在這三卷中，吉朋一共使用 4,384 個註腳，內容豐富，足以呈現吉朋歷史書寫的「工藝」。

12 G. W. Bowersock, “The Art of the Footnote,” *The American Scholar* 53, no. 1 (Winter 1984, Washington, DC), pp. 55–56.

13 D. M. Low, *Edward Gibbon, 1737–179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7), p. 328.

14 David P. Jordan,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 40.

15 Jordan, “LeNain de Tillemont,” p. 483.

16 吉朋的《衰亡史》原書分為 6 卷，前 3 卷敘述西羅馬帝國衰亡史，後 3 卷則涵蓋東羅馬帝國衰亡史。1890 年代，英國古代史學者 J. B. Bury（1861–1927）對吉朋《衰亡史》文本進行深入的校訂工作，尤其對《衰亡史》的註腳作了仔細的考訂，指正不少原註的誤失，並根據 19 世紀古代史研究的新進展補充了原註的內容。對吉朋研究而言，這是《衰亡史》一書迄今最完備、方便的版本。Bury 的《衰亡史》考訂版，在 1896–1902 年由倫敦 Methuen 出版公司出版。不過，其考訂版將吉朋原書的 6 卷重新分為 7 卷，因此在 Methuen 版中，吉朋原書前 3 卷的最後 3 章（36–38 章）被歸入第 4 卷。1905–1906 年，Methuen 出版公司發行 32 開的普及版，納入 Methuen’s Standard Library 系列：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Methuen & Co, 1905–1906)，本文使用此一版本。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說明史源採用原則

古典時代，歷史書寫以「當代史」為主，躬歷事件者的見證被認為是最可靠的史源。修昔底德（Thucydides, c. 460–400 BCE）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說：

> 我描述的事件，要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親自看見這些事件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的。即便這樣，真實還是不容易發現的：不同目擊者對同一事件有不同說法，他們或偏袒這一邊，或偏袒那一邊，或由於記憶不完全。[17]

修昔底德確立了古典史學對可靠史源的定義。近代早期的人文主義史學延續此一原則，認為愈接近事件發生時的紀錄是愈可靠的證據，包括事件當事人、旁觀者或史家的記述。[18]

吉朋深受古典史學影響，重視接近史事現場的見證。《衰亡史》第 12 章敘述皇帝奧瑞連（Aurelian, 270–275 在位）時期，引《羅馬皇帝集傳》（*Historia Augusta*）中弗畢斯庫斯（Flavius Vopiscus）執筆的〈奧瑞連傳〉（The Life of Aurelian）為主要史源。這部集傳是 4 世紀初一群作者的集體著作，其價值與可靠性頗受 16 世紀以來古典學者的爭議，吉朋卻仍引用其〈奧瑞連傳〉，並在註腳說明引用理由：

> 弗畢斯庫斯是我的主要引據來源，他在奧瑞連逝世僅 16 年之後在羅馬寫此傳記；除掌握新近的當然事實外，他還常從《元老院議事錄》（*Journal of the Senate*）和烏爾比安（Ulpian）圖書館藏原始文獻抄錄資料。[19]

17 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20。

18 Robert Black,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no. 378 (January 1981, Oxford), pp. 36–58.

1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18, n. 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弗畢斯庫斯撰寫〈奧瑞連傳〉，乃是同時代人寫同時代事，又有機會查閱一手資料，應具有可信度。又如，西元 360 年高盧的羅馬駐軍譁變，擁立朱里安為皇帝（第 22 章），「有關此一譁變的完整敘述」，吉朋在註腳中指出，「有真實的與原始的材料可資引用」。這些資料包括：

> 朱里安《致雅典人書》（*Epistula ad S. P. Q. Atheniensem*）、李班紐斯（Libanius, 314–393）《致父母演說集》（*Orationes Parental*）、阿米亞努斯《羅馬史》、卓西莫斯《新羅馬史》。卓西莫斯寫朱里安時期史事，似是依據更受尊重的尤納比烏斯（Eunapius, c. 345–420）權威著作。有這些引導，我們或許可以忽略那些節略本和教會史家著作。[20]

李班紐斯、阿米亞努斯和尤納比烏斯等作者都是朱里安的同時代人。再次，西元 381 年狄奧多修（Theodosius, 379–395 在位）迫害異教，毀壞其神廟。《衰亡史》第 28 章描寫狂熱的基督徒擅自欺凌異教徒，毀壞其古老建築：「在此一廣泛與各樣的被毀景物中，觀者在亞力山卓（Alexandria）或許能辨識出榭拉庇斯（Serapis）神殿的廢墟。」[21]吉朋在註腳中說明資料引證原則：

> 聖日羅莫寫了一部時間最接近、單獨的歷史：《論教會作者》（*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這部書提供材料給蘇克拉提斯、狄歐多瑞（Theodoret of Cyrus）和魯費努斯（Rufinus）。不過，最後一位在事件發生前後曾在亞歷山卓城，當得原始見證者之榮譽。[22]

魯費努斯（Tyrannius Rufinus, 344/5–411）是聖日羅莫的門徒，在亞歷山卓目睹了基督徒的暴亂。這幾個註腳界定了吉朋對史料可靠性的條件：記錄的時間須接近事件發生時，或者記錄者須親臨事件現場。

吉朋重建羅馬帝國衰亡史，核心的史料基礎是羅馬作者留下的「敘事性史源」（narrative sources），包括史書、傳記、法典、政書、書信、

2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02, n. 12.

2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98.

2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98, n. 4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篇等。這些史料來源複雜，內容參差，常真偽難斷。面對這種狀況，吉朋如何選擇可靠史源？

羅馬史家的史作是吉朋廣泛引用的史源，從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c. 55–117）、狄翁（Dio Cassius, c. 150–235）、阿米亞努斯，到不知名的作者。這些史作未必可靠，須作鑑別。吉朋對公認的權威，如塔西佗《編年史》（*Annals*）和《日耳曼誌》（*Germania*）、狄翁《羅馬史》（*Historia Romana*）、蘇東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c. 69–122）《十二皇帝傳》（*The Twelve Caesars*）等，採用上比較沒有遲疑。但對可靠性有疑慮者，尤其 4 世紀以後史書，態度就比較審慎，常在註腳中討論可靠性問題。

阿米亞努斯是吉朋寫 4 世紀羅馬史時最倚重的史家。他是希臘人，早年在羅馬軍隊服役，退伍後投入《羅馬史》的寫作。《衰亡史》第 26 章的註腳指出：「我們不知他何時離開軍隊，定居羅馬，似乎在那裡書寫他自己時代的歷史」；[23]在第 31 章，吉朋稱阿米亞努斯是書寫「自己時代的歷史家」。[24]對吉朋來說，阿米亞努斯以一個 4 世紀晚期羅馬人身分書寫自己時代的歷史，這是《羅馬史》一書值得信賴的重要理由。

不僅如此，阿米亞努斯服役時，曾隨從烏爾西希努斯（Ursicinus）麾下，親歷許多歷史現場。《衰亡史》第 19 章敘述西元 355 年羅馬將領希爾凡努斯（Claudius Sylvanus, 310–355）的遭遇。這年蠻族入侵高盧邊境，希爾凡努斯奉命綏靖，卻遭政敵構陷，被誣叛逆，憤而在科隆（Cologne）自立。皇帝康士坦修（Constantius II, 337–361 在位）派烏爾西希努斯前往遊說希爾凡努斯回羅馬。然而當烏爾西希努斯到達科隆，發現已無法挽回，遂以自己也受過迫害，裝作同情希爾凡努斯，並帶著隨從投效旗下，卻秘密運作希爾凡努斯的軍隊將其刺殺，「辜負了一個

2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05, n. 84.

2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95. 有關阿米亞努斯生平與史學概略，參見 M. C. Howatson and Ian Chilvers, eds.,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老實朋友的信任」。[25]吉朋的敘事根據是《羅馬史》第 15 書，他在註腳說明採據理由：「阿米亞努斯完全深悉希爾凡努斯的作為和命運。他本人是烏爾西希努斯出這趟危險任務時，少數的隨從之一。」[26]西元 359 年，波斯軍隊入侵兩河，圍攻亞米達（Amida）城，阿米亞努斯參與該城保衛戰，見證戰役過程。吉朋在第 19 章的註腳中說：「阿米亞努斯詳細描述亞米達之圍。波斯人襲擊該城時，他光榮參與保衛戰，且好不容易才逃脫。」[27]在這兩個註腳中，吉朋凸顯史家是否親臨現場是衡量其敘事可靠性另一要件。

同樣標準也適用於判斷「傳記」的可信度，傳記也是吉朋常用的史源。《衰亡史》第 16 章敘述 3 世紀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寫到北非主教賽普瑞安（Cyprianus, c. 210–258）的殉教，吉朋認為關於此課題有「極公正和不偏頗的紀錄」可資引用，便在註腳討論史料：

> 我們有一部教會執事龐提烏斯（Pontius the Deacon）寫的一手《賽普瑞安傳》（按：*Vita Cyprian*）。賽普瑞安被放逐時，龐提烏斯隨侍在側，也親見他的殉道；我們也保有古老的羅馬總督有關他的殉教行傳。這兩種敘述之間存在一致性，也有可能性；多少有點引人矚目的是，兩者都未沾染任何奇蹟的情況。[28]

龐提烏斯（?–262）是賽普瑞安門徒，隨他流放北非。賽普瑞安殉教時，龐提烏斯是埃及教會執事，見證其殉道，並隨即寫下《賽普瑞安傳》。總之，龐提烏斯的敘事符合「同時代性」與「親眼見證」原則。吉朋還提到兩項優點：龐提烏斯的敘述與羅馬官方紀錄一致，且未沾「任何奇蹟」色彩。在吉朋看來，這是部可信賴的紀錄。

相對的，《羅馬皇帝集傳》中的〈亞歷山大傳〉（Life of Severus Alexander），就不是恰當的史源。吉朋認為那只是一篇「理想化的君主

2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60.
2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60, n. 43.
2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69, n. 62.
2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00, n. 8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記，拙劣摹仿色諾芬（Xenophon）的《居魯士的教育》（*Cyropaedia*）」。相較之下，希臘史家希羅迪安（Herodian, c. 170–240）《羅馬帝國史》（*τῆς μετὰ Μάρκον βασιλείας ἱστορία*）關於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 222–235 在位）的敘述，「不僅合理、適切，也與那一時代大部分歷史一致」，一些細節還可用「狄翁決定性的殘篇來印證」。但是，吉朋感嘆，一些近代學者，如提勒蒙（Sébastien Le Nain de Tillemont, 1637–1698）和吳頓（William Wotton, 1666–1727），出於「不足取的偏見，都苛待希羅迪安，反而襲抄《羅馬皇帝集傳》」。[29]吉朋認為，希羅迪安活躍於亞歷山大時期，寫的是其當代史，比 4 世紀的《羅馬皇帝集傳》要可靠得多。

吉朋也注意到「官書」的史料價值。《衰亡史》重建西元 4 世紀羅馬帝國史時，參證的官書包括：《帝國職官錄》（*Notitia Dignitatum*）、《狄奧多修法典》（*Codex Theodosiani*）、君士坦丁七世《帝國行政論》等。《帝國職官錄》成書於西元 395 到 407 年，記載帝國東西部的官職和軍職，吉朋在註腳中指出這是了解帝國後期行政組織的「有用著作」。[30]《狄奧多修法典》頒布於西元 438 年，形式上是一部法典，卻是了解西元 4、5 世紀帝國政治狀況「一個充分、豐富的寶庫」。[31]這兩部官書均是一手史料，可靠性無庸置疑。

西元 331 年，君士坦丁一世與克里米亞西岸徹爾松人（Chersonites）結盟，擊潰哥德軍隊。吉朋敘述此一史事（第 18 章）時，「毫不遲疑的引證」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國行政論》。這部書出自一名 10 世紀的拜占庭皇帝之手，吉朋曾說其敘述「自己的時代時非常精確，過去的時代則毫無根據」。[32]在此，吉朋何以敢於引用它來敘述這段 6 個世紀前的史事？他覺得有必要說明，就在註腳中辯解：

2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78, n. 80.

3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58, n. 73.

31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72.

3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6, p. 132, n. 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知道，他是 10 世紀希臘人，且其古史敘事經常混淆、無據。不過，有關此一史事，他的敘事大都有一致性與可能性；吾人也不難理解，一個皇帝還可能接觸到一些秘密檔案，這不是一般史家靠努力能接觸到的。[33]

君士坦丁七世的敘事有一致性和可能性，而且還可能引用政府檔案。由是，吉朋認定《帝國行政論》敘述哥德戰爭應屬可靠，可以放心引證。

吉朋還注意到文學作品的潛在史料價值，特別是一些敘事詩。《衰亡史》引用過 2 世紀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61–c. 113）的《讚美詩》（*Panegyricus*）、3 到 4 世紀間的《拉丁讚美詩彙編》（*Panegyrici Veteres*），以及 4 世紀後期克勞狄安（Claudius Claudianus, c. 370–404）寫的一系列讚美詩。

4 世紀末、5 世紀初，西哥德入侵義大利，史料大都在戰亂中散佚。吉朋書寫這段歷史時，積極引用文學作品作為史源：「考察一個欠缺可信資料的時代，我們不得不採用一位同時代作家的惡言或頌詞，來詮敘霍諾留斯（Flavius Honorius Augustus, 393–423 在位）時期的史事。」[34]其中，克勞狄安的讚美詩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克勞狄安出生於北非，西元 395 年渡海到羅馬，進入宮廷成為西羅馬皇帝霍諾留斯的御用詩人，「以詩篇為他效命」。克勞狄安寫了多部敘事詩，主要在詠頌霍諾留斯，但同時也大肆攻擊拜占庭的權臣魯非努斯（Flavius Rufinus, d. 395）和攸卓比烏斯（Eutropius）。[35]克勞狄安另有三卷頌詩，以「最光芒的色調頌揚一個有力恩主的功業與德操」：史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 c. 365–408）。史提利科是皇帝狄奧多修的女婿，也是帝國主將；狄奧多修死後，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他又輔佐霍諾留斯統治帝國西部，力抗哥德人的入侵，成為帝國支柱。吉朋在註腳中指出：「史提利科直接或間接地一直是克

3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18, n. 45.

3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4.

3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4. 在《抨擊魯非努斯》（*In Rufinum*）和《抨擊攸卓比烏斯》（*In Eutropium*）中，克勞狄安以冷酷不帶感情的手法分析魯非努斯和攸卓比烏斯。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勞狄安詠頌的主題。」[36]

吉朋的眼光獨到，竟能把文學性質的讚美詩，轉化為勾稽 4 世紀末、5 世紀初西羅馬帝國歷史的珍貴資料。西元 398 年，羅馬非洲總督吉爾多（Comes Gildo, d. 398）反叛，史提利科率軍平亂。克勞狄安寫敘事詩〈吉爾多戰爭〉（Gildonic war）詠此事，《衰亡史》第 29 章敘述這件史事時，即倚賴這些詩歌：「吉爾多戰爭第一書結束於此。克勞狄安此詩的其他部分業已佚失，我們無從得知他的軍隊是*如何*或在*何處*順利登陸非洲。」[37]克勞狄安〈吉爾多戰爭〉未能完整保存，使吉朋無法完整地書寫史提利科的吉爾多戰爭。

敘事性史源不足時，吉朋改以古文物學者的研究補充。從 16 到 18 世紀，歐洲古文物學者致力考訂古代文本，累積豐富的古史證據，可用以洞照古代史。吉朋甚至認為近代學者梳理過的文獻，有時比原典清楚。例如，他評論提勒蒙的《羅馬皇帝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瞭解這部分奧古斯都時期歷史，讀此一博學和精確的編纂，遠比閱讀既無方法、也不準確、又欠文采、更乏年序的原著為佳。」[38]《衰亡史》第 15 章處理早期教會行政體制，即採用莫斯海姆（Johann Lorenz von Mosheim, 1694–1755）的《教會史》（*Institutione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Antiquae et Recentioris*）：「有關基督聖統制度的歷史，我大部分採用既博學又公正的莫斯海姆。」[39]吉朋認為教會人士討論此事時恆帶宗派偏見：「羅馬、巴黎、牛津、日內瓦的論者，皆意圖把初始與使徒時代教會描繪成自己認定的形式。」[40]相對地，近代古典學者反而保持比較公正的態度。

近代以來，古文物學者蒐集、考訂大量羅馬時代的紋章、錢幣、銘

3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4, n. 17.

3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35, n. 49.

38 D. M. Low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 1763* (New York: W. W. Norton, 1929), p. 163.

3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0, n. 106.

4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等物質史料，成為不可或缺的非敘事性史源。《衰亡史》第 3 章引用格魯特（Jan Gruter, 1560–1627）《古羅馬銘文彙編》（*Inscriptiones antiquae totius orbis romani*, 1603），討論西元 1 世紀羅馬皇帝的權力，並在註腳說明：

> 參見一份元老院令的片段，這份命令授予皇帝韋斯巴西安（Vespasian）所有賦予過去皇帝奧古斯都、泰比留斯（Tiberius）和克勞狄烏斯（Claudius）的權力。這一份稀有的重要文件，收入格魯特的《羅馬銘文彙編》。[41]

格魯特是低地國古典學者，收集大量羅馬帝國銘刻。吉朋也使用同書的銘文，考究帝國時期羅馬奴隸的處境：「格魯特和其他收藏家收集大量銘刻，是奴隸紀念其妻子、子女、同僚、主人的銘文。這些銘刻最可能來自帝國時期。」[42]吉朋根據這些銘文，推斷當時的羅馬奴隸有「受教育的習慣」；加上被鼓勵成家、可擁有財產，這些情況可以說明帝國時期的奴隸境遇應該不差。[43]

《衰亡史》中多處處理到東方議題。吉朋不懂東方語文，無法直接引用文獻，即採近代歐洲東方學者的翻譯，特別是耶穌會士著作。《衰亡史》第 26 章講到羅馬與哥德的戰爭，追述哥德人的遷移，並論及漢朝與匈奴的關係。吉朋處理此議題時，引用法國傳教士馮秉正（P. de Mailla, 1669–1748）翻譯的朱熹（1130–1200）《資治通鑑綱目》。吉朋在註腳中說明：

> 參見《中國歷史》〈劉邦（或高帝）紀〉（*Hist. de la Chine*, Paris）。此一卷疊浩繁史著，乃馮秉正翻譯《通鑑綱目》而成。《通鑑綱目》是司馬光《資治通鑑》（西元 1084 年）這部巨構及其續修本的精簡版。[44]

4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66, n. 19.

4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40, n. 51.

4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40.

4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83, n. 3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777 年，馮秉正編譯的《中國通史》十二卷在巴黎出版。[45]當時吉朋正在準備《衰亡史》第 2 卷的材料，馮秉正的譯著正好派上用場。

二、討論史料處理手法

吉朋在書寫《衰亡史》的過程中，經常在註腳向讀者說明自己處理史源的方式。這些說明文字提供豐富的訊息，有助於理解吉朋歷史敘述的形成過程。如《衰亡史》第 3 章敘述西元 1 世紀初羅馬帝國政制，吉朋在註腳說明，他參照了狄翁的《羅馬史》。不過，吉朋抱怨狄翁僅提供「鬆散和局部的概述」，未能清晰呈現羅馬政制。為了釐清並校正狄翁的誤失，吉朋說：

> 我引證塔西佗，檢視蘇東尼烏斯，並參閱下列近代學者：布列帖瑞（Abbé de la Bléterie）論文、波福（Louis Beaufort）《共和時期的羅馬》（*République Romaine*）、諾德特（Gerhard Noodt）和格羅諾維烏斯（Jacobus Gronovius）《帝國法制》（*de lege Regia*）、葛拉維納（Giovanni Vincenzo Gravina）《羅馬帝國》（*de Imperio Romano*）、馬費（Scipione Maffei）《凡戎納史》（*Verona Illustrata*）。[46]

這個註腳告訴讀者，吉朋處理羅馬帝國政制時，狄翁提供基本架構，但完整的描述則參照了塔西佗和蘇東尼烏斯的記述，以及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成果。

吉朋的歷史書寫恆循一個模式：蒐集同一史事的多種史源，讓其相互印證、截長補短，再整合成一個一致的敘事。參證多重史源，目的是確保敘事完整與精確。但是，不同史源的敘事常不一致，吉朋如何處理

45 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Paris: P.-D. Pierres and Clousier, 1777–1785).

4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68, n. 2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狀況？《衰亡史》第 5 章寫到西元 193 年 3 月 28 日禁衛軍謀害皇帝帕提納克（Pertinax, 192–193 在位）後拍賣帝位。元老院元老朱里亞努斯（Didius Julianus, 133–193）競標得手，在禁衛軍簇擁下進駐皇宮，瞧見先皇遺體尚蜷曲於地上。「盛宴結束後，奉承者散去，留下他一人孤單的在暗夜中冷靜反思這恐怖的一天，竟至徹夜難眠！心中反覆的，可能是自己的魯莽愚蠢，賢明先皇的悲慘命運，以及非由功勳、而以金錢取得帝位的不確定和危險。」[47]寫到這裡，吉朋在註腳中告訴讀者，這段敘述是根據狄翁《羅馬史》和《羅馬皇帝集傳》：「我致力將兩位作者看起來互相矛盾的敘事，整合成協調一致的故事。」[48]

不同史源對同一事件的敘述不一致，史家固須介入處理，但若差異細微，無礙整體敘事，或可容忍不論。《衰亡史》第 25 章處理皇帝周維安（Jovian, 363–364 在位）暴斃原因，發現古代史家的說法不一：一說是因前一晚飲酒過量或吃太多蘑菇致死，一說是在睡夢中吸入過多炭煙窒息而亡。吉朋覺得這些歧異無關宏旨，毋庸花力氣爭論，就在註腳說：「我們不能期待他們完全一致，同時，我們也不用討論一些瑣細差異。」[49]另一例子是西元 276 年，賢明的皇帝塔西陀（Claudius Tacitus, 275–276 在位）遠征波斯，戰功彪炳，卻因部隊的放縱無紀苦惱不已，心力交瘁，不久後在前線駕崩。史家對他的死因同樣有不同說法，吉朋在註腳指出：尤卓比烏斯和維克特（Aurelius Victor, c. 320–390）只說他逝世了；小維克特（Victor Junior）進而說他死於熱病，卓西莫斯則肯定他是被士兵殺害；弗畢斯庫斯不能確定何者為是，只好二說均保留。吉朋認為這些不同的說法，其實「可以容易地予以調和」，[50]他在正文中這樣寫道：「士兵們的手是否沾染到這位無辜君王的鮮血，這一點或許尚有疑問，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不遜乃是他的死因。」[51]在吉朋看

4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07.

4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07, n. 14.

4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6, n. 16.

5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24, n. 19.

5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2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皇帝塔西陀雖然死於疾病，但是軍人的蠻橫致使其憂勞成疾，則是他致死的主因。

許多史源的內容曾經過後世作者的踵事增華，而失去原貌。這種現象常見諸教會歷史，使用時須予留意。《衰亡史》第 16 章提到皇帝菲律普（Philip, 244–249 在位）善待基督徒，時人甚至懷疑他改宗基督教。吉朋發現此一說法竟成為一則寓言的基礎：菲律普藉告解和悔罪，洗清他因謀害無辜的前任皇帝犯下的**罪愆**。吉朋在註腳中指出：「這一則故事，如尋常般，經過後續作家的踵事增華，斐特烈．史班漢（Frederick Spanheim, 1632–1701）花了太多不必要的學問，予以駁斥。」[52]言下之意是：菲律普改宗這一說法應屬後世基督教作者編造，不值得大費周章考究。類似例子是 2 世紀基督教作者特圖良（Tertullian, c. 155–c. 220）記載泰比留斯（Tiberius, 14–37 在位）保護基督徒的故事。吉朋在註腳中追蹤這則故事的發展系譜，發現源頭乃是一則薄弱的證據：猶太行省羅馬長官比拉特（Pontius Pilate, 26–36 在位）的一篇證辭：

> 比拉特的證辭，是查士丁（Justin）最早提到。這則故事後續經過多手增補，從特圖良、優西比烏斯、伊皮凡尼烏斯（Epiphanius of Salamis, c. 310–320 –403）、克里梭斯通（John Chrysostom, 347–407）、歐羅修斯（Orosius, 385–420）、都爾的格列哥里主教（Gregory of Tours, 538–594）、還有數個版本比拉特行傳（*The acts of Pilate*）的作者。卡爾梅特修士公正地追蹤此一故事的演變。[53]

卡爾梅特（Antoine Augustin Calmet, 1672–1757）是法國的本篤會修士，也是古典學者。吉朋引用其《聖經緒論》（*Dissertations qui peuvent servir de prolégomènes à l'Écriture Sainte*）指陳此一故事層累構成的性質。

敘事性史源有時會帶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場，而有明顯的偏見。西元 362 年，「叛教者」朱里安恢復異教崇拜，引起重大爭議。《衰亡史》第 23 章敘述朱里安重立異教的過程，使用四種資料：朱里安《恨鬍鬚者》

5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13, n. 121.

5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08, n. 10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Misopogon*）、修辭家李班紐斯《致父母演說集》與《論朱里安執政演說集》（*Orationes Consula. ad Julian*）、史家阿米亞努斯《羅馬史》和聖徒納濟安真（Gregory Nazianzen, 329–390）《演說集》（*Orationes*）。吉朋在註腳中評論這幾位作者：

> 在根本的、甚至瑣細事實的敘述上，這些作者有一致性；但他們從不同立場看朱里安的極端信仰，表達不同角度評價，從自我喝采、熱情的仰慕、溫和的申斥，到偏頗的非難。[54]

只要適當地處理，吉朋相信，不同立場的史料也有助於重建歷史真實：「我們握特別優勢，可比較他的仰慕者和死敵所描繪的畫像。」這樣的比較可移除對朱里安「先入為主的偏見」，而對其性格與作為作「更精確的描述」。[55]

吉朋對於古代史家不合常理的敘事，盡量保持審慎的態度。《衰亡史》第 29 章描寫西帝國皇帝霍諾留斯性格軟弱、了無生氣，無能承擔治國之責。這位年輕皇帝成日在宮中「以養家禽為樂，視為君王之要事」，而將帝國大事委予穩健幹練的史提利科之手。[56]吉朋在註腳中引用拜占庭史家普羅柯比烏斯（Procopius, c. 500–565）《戰史》（*οἱ ὑπὲρ τῶν πολέμων λόγοι*）中一則報導，來支持他的陳述。西元 410 年，西哥德王阿拉瑞克（Alaric I, c. 370–410）攻陷羅馬城，《戰史》敘述霍諾留斯的反應：

> 那時，他們說，皇帝霍諾留斯在拉文納宮中，從太監接到消息，這位太監顯然是幫他照顧公雞的人，說羅馬完蛋了。霍諾留斯一聽，大叫：「但是，它才剛從我手上吃東西啊！」霍諾留斯養一隻大公雞，取名羅馬。太監明白皇帝在說什麼，就說：是羅馬城被阿拉瑞克毀了。皇帝聽完，鬆了一口氣，很快回說：「但是，好傢伙，我

5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47, n. 37.

5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432.

5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p. 238–23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以為我的公雞羅馬毀了。」他們說，這位皇帝實在太荒唐。[57]

吉朋接受霍諾留斯在宮中養雞自娛的說法，但質疑普羅柯比烏斯傳述的故事可信度：「我引用書中關於霍諾留斯尋常舉止的敘述，但不採信這位希臘史家講述的奇異，但實際上不可能的事。」[58]這個例子也顯示吉朋採用證據時的審慎態度。

對克勞狄安詩篇這種非傳統資料，吉朋儘量以其他資料予以印證或闡明。吉朋了解詩語言的特性：「克勞狄安似乎擁有一介詩人和廷臣的特權，我們需要一點考證，將其虛構或誇張的語言，轉化成真實、單純的歷史散文」。[59]如何將「詩」的語言轉化成「歷史」證據？一個途徑是拿其他史家的記載，來佐證、闡發詩中隱而不發的史事。吉朋在第 29 章描寫羅馬帝國晚期要角史提利科的德行，引用克勞狄安讚美詩《執政史提利科頌》（*De Consulatu Stilichonis*），在註腳說：「克勞狄安優美的詩句展現自己的才華：但是卓西莫斯不經意的證據，為史提利科在軍事行政上的廉正，提供遠為堅實的證明。」[60]

吉朋常引用卓西莫斯《新羅馬史》的敘事，來補充克勞狄安詩歌較為空泛的描寫。《衰亡史》第 29 章根據克勞狄安《抨擊魯非努斯》（*In Rufinum*）詩，揭露拜占庭權臣魯非努斯的貪婪：「雖然條條金流都匯流其身，但其熱度一點都未降溫，……財富聚集如山，還闢一專房收受各地送來的掠奪品。」吉朋在註腳中提出印證：「聖日羅莫是公道的證人，譏他是隻貪婪的十足蟲。卓西莫斯和蘇伊達斯（Suidas）也可印證。」[61]同一章敘述魯非努斯的惡行，也在註腳中引《抨擊魯非努斯》：「凡事都慢半拍，幹壞事卻急如律令，窮追仇敵到天涯海角。」魯非努斯實際上作了何壞事？吉朋的註腳說：「克勞狄安此處的隱喻，再度由卓西莫

57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vol. II: books 3–4. (The Vandalic War)* trans. H. B. 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5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38, n. 62.

5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4.

6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6, n. 22.

6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0, n. 1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的詳盡敘事，給予說明。」[62]正文中，吉朋根據卓西莫斯《新羅馬史》，講述一則故事：高盧權貴魯西安（Lucian）重金賄賂魯非努斯，取得東方行政長官一職。但魯希安行事意外地寬和公正，開罪皇帝阿卡迪烏斯（Arcadius, r. 383–403）的叔父。魯非努斯為取悅皇帝，決意懲治魯西安，以八百里加急速度，連夜自君士坦丁堡趕到安提阿（Antioch），用殘酷手段處決魯西安後，又急急趕回君士坦丁堡。[63]卓西莫斯的敘事，讓克勞狄安的詩句有了具體的內容。

西元 400–403 年，西哥德人入侵義大利。吉朋處理這段歷史時，遇到史料殘缺問題：「史實稀少加上日期不確定，妨礙我們描述阿拉瑞克第一次揮軍義大利的詳情。」[64]他在第 30 章寫這段史事，註腳中說明依據的史源：

> 最好的資料是克勞狄安敘述蓋提戰爭（Getic War）和祝賀霍諾留斯第六度執政的 970 行詩句。關於此事，卓西莫斯完全沉默，我們只能盡量從歐羅修斯《反異教史》（*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和編年史中揀出一些殘片，或者碎屑。[65]

根據這些殘篇，吉朋推測阿拉瑞克進軍路線：可能自帖薩隆尼卡（Thessalonica）出發，經過潘農尼亞（Pannonia），遠達阿爾卑斯山山麓。在這過程中，阿拉瑞克通過防禦堅強的山脈，包圍阿揆列亞（Aqualeia），征服伊斯垂亞（Istria）與威尼西亞（Venetia）。[66]

吉朋敘述 4 世紀末羅馬城的風俗習尚（第 31 章），認為阿米亞努斯

---

6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22, n. 12. 吉朋引克勞狄安拉丁文原詩：

Caetera segnis;
Ad facinus velox; penitus regione remotas
Impiger ire vias.

[Slow to all else he is swift to crime and tireless to visit the ends of the earth in its pursuit.]

6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p. 221–222.

6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p. 248–249.

6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48, n. 26.

6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4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馬史》的描繪可以恰當呈現羅馬的原本習尚。他決定直接錄引原文，但覺得阿米亞努斯的敘述需要調整，才能融入自己的敘事架構。他在註腳中交代處理原則：

> 我有責任說明我處理阿米亞努斯文本的原則：一、我把第 14 書第 6 章與第 28 書第 4 章融合成單一敘述。二、我把一堆凌亂的材料整理出一個秩序與關聯。三、我調整一些過於誇大的文字，也刪除累贅的敘述。四、作者一些隱含、未明說的觀察，我將其闡述明白。[67]

經過一番處理，吉朋自信地告訴讀者：「我的版本，雖然不是逐字逐句跟隨，卻仍是忠實的和精確的。」[68]

吉朋常會在註腳中保留引證的原文，以證明自己敘事精確。《衰亡史》第 22 章敘述朱里安即位後看到拜占庭宮廷豪奢風氣，引述了一則故事：朱里安召來一位御用理髮師理髮，驚訝這位理髮師衣著華奢，不下於一個財政大員。理髮師告訴他，自己除有豐厚薪資和獎金，每天還有 20 個僕從和 20 匹馬來服侍。在君士坦丁堡宮中，吉朋根據史家李班紐斯的記載，雇了「一千名理髮師、一千名斟酒師、一千名廚師……宦官人數更只有夏日的昆蟲可以比擬」。寫到這裡，吉朋在註腳中特別引錄李班紐斯原文：

> Μαγείρους μὲν χιλίους, κουρέας δὲ οὐκ ἐλάττους, οἰνοχόους δὲ πλείους, σμήνη τραπεζοποιων, εὐνούχους ὑπὲρ τὰς μυίας παρὰ τοις ποιμέσι ἐν ἠρι,

並說「這就是李班紐斯原文，我忠實引用，以免受人質疑誇大宮廷弊端」。[69]這段原文譯文為：「一千位廚師，同樣多的理髮師，和甚至更多的膳食領班。更有一大群侍者，宦官人數比春天時纏繞牲畜四周的蒼

6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95, n. 35.

6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95, n. 35.

6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20, n. 57: "A thousand barbers, a thousand cup-bearers, a thousand cook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several offices of luxury; and the number of eunuchs could be compared only with the insects of a summer's day."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蠅還多，及大批各類無所事事的人員。」[70]對照李班紐斯的原文，可證明吉朋的引證十分精確，但行文比其文雅：李班紐斯譏諷君士坦丁堡宮廷宦官猶如「春天的蒼蠅」，字裡行間帶著憤懣；吉朋則稍加修飾，形容他們是「夏日的昆蟲」，筆調多了些許文雅。

《衰亡史》第 16 章，吉朋引基督教聖徒奧瑞根（Origen, c. 185–c. 254）的證言，指出羅馬政府迫害期間，教徒的殉教人數不多，來反駁教會人士的誇大其辭：「博學的奧瑞根依據經驗和閱讀，深入教會史，明白點出殉教人數並不多。」他註腳中保留奧瑞根《反駁異教徒謝爾參》（*Adverse Celsum*）原文，證明自己所言不虛：

> 他的一段話值得直接抄錄：“Ὀλίγοι κατὰ καιροὺς, καὶ σφόδρα εὐαρίθμητοι περὶ [leg.ὑπὲρ] των Χριστιανων θεοσεβείας τεθνήκασι.”[71]

這句話文意為：「一些信徒，人數可容易算出，在特別時刻為基督信仰受難。」吉朋引奧瑞根友人戴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 d. 264）的見證，來印證奧瑞根「一些信徒」的斷言。他指出，德西烏斯（Decius, 249–251 在位）朝迫害時，戴奧尼修斯本人恰在亞力山卓。據他核算，在這座人口眾多的城市，僅有 10 位男性和 7 位女性教徒殉難。吉朋在註腳中加註說：「這 17 人中，有一位同時被控犯搶劫罪。」[72]

三、歷史考訂與解釋

吉朋使用史源時，偶爾會遇到文字、史實或文意不明之處，必須著

70 Loeb 古典叢書李班紐斯英譯本：“There were a thousand cooks, as many barbers, and even more butlers. There were swarms of waiters, eunuchs more in number than flies around the flocks in spring, and a multitude of drones of every sort and kind.” 見 Libanius, ‘Orations XVIII,’ in *Libanius Selected Orations*, ed. and trans. A. F. Nor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 1, p. 130.

7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98, n. 72.

7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98, n. 7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手處置。這類問題的處理，大都在註腳中完成，以避免影響正文敘事的連貫與順暢。吉朋時代的歷史書寫尚維持人文主義史學的精神，除了呈現歷史「真實」外，也重視敘事的流暢。由是，敘事過程中必要的學術討論，無法在正文中呈現，而註腳的大量使用，協助解決了此一歷史書寫難題。

吉朋在引用古典的史著——主要是拉丁文——的過程中，偶爾會遇到文意不明處，這類問題常源自字詞的訛誤，須適當訂正。吉朋精通拉丁文，年輕時練習過文字考訂工作，他雖不是專業的考證學者，但對拉丁文有一定敏感度。[73]《衰亡史》偶會在註腳中考訂、辨正一些拉丁文本的文字問題。

古典文本出現訛誤，會造成與史實的脈絡不符，或者文意模棱兩可。《衰亡史》第 12 章引《羅馬皇帝集傳．普羅布斯傳》（*Historia Augusta*．Probus）中普羅布斯（Marcus Aurelius Probus, 276–282 在位）致元老院的一封信，日期落在：「*Non. Februar*」（二月）。吉朋在註腳中確定此日期是訛誤，建議訂正為「*Non. August*」（八月），才符合普羅布斯登基時間（按：西元 276 年 4 月）。[74]第 16 章解釋早期基督徒何以受羅馬人迫害，引用史家塔西佗一句話：“*Odio humani generis convicti.*” 吉朋在註腳中指出這句話可解讀為：基督徒因「人類對基督徒的憎惡」被定罪，或因「基督徒憎惡人類」被定罪。吉朋採用後者，「因最符合塔西佗的語調」。何況，此一詮釋有古典學者，如利比西烏斯（Justus Lipsius, 1547–1606）、莫斯海姆、勒科拉克（Jean Le Clerc, 1657–1736）、拉德納（Nathaniel Lardner, 1684–1768）等權威學者的支持。[75]

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文字訛誤，通常只須更動一個字母即可解決。《衰亡史》第 16 章引用拉克坦休（Lucius Lactantius, c. 240–320）的《受迫

73 有關吉朋早年的考訂訓練，參見楊肅獻，〈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149–150。

7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27, n. 30. “The date of the letter is assuredly faulty. Instead of Non. Februar. we may read Non. August.”

7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85, n. 3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害死難者》（*De Mortibus Persecutorum*），敘述西元 303 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 在位）毀壞尼柯美迪亞（Nicomedia）教會史事。吉朋在抄本中讀到 “Praetorian profectus” 一詞，覺得與文意無法相容。不過，他發現只須把 “*profectus*” 改成 “*praefectus*”，文句即豁然貫通。他在註腳中說：

> 在拉克坦休的抄本，我們讀到 “*profectus*”（動身、出發）一字，但所有考證家的理由和權威，允許我們換成 “*praefectus*”（羅馬長官）一字。前一字破壞了整個文句的意思。[76]

在《衰亡史》第 10 章，吉朋根據周南德斯的《哥德人史》介紹西元 250 年達西亞省（Dacia）。他在《哥德人史》讀到一個地名：“secundo Mæsiam”，認為其中 “*secundo*”（意即：其次）一字不妥，應訂正為 “*secundam*”（意即：第二）。“*secundam* Mæsiam” 即「第二梅西亞省」，是戴克里先從下梅西亞省（Inferior Maesia）分出的一省。吉朋在此順口諷刺古典學者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說他考訂《哥德人史》竟未發現此一訛誤：「讓人訝異的是，此一明顯手民之誤，居然逃過格勞秀斯考證的法眼。」[77]

有些訛誤比較複雜，則需要費心考訂。《衰亡史》第 10 章引維克特《羅馬皇帝簡史》（*Epitome de Caesaribus*），敘述西元 256–268 年間法蘭克人（Franks）蹂躪西班牙，摧毀其繁華城市塔拉哥納（Tarragona）。吉朋發現維克特的文本使用 “*Pæne direpto*” 一詞，文意是法蘭克人「除了沒有掠奪，幾乎全毀」了塔拉哥納。這顯然不符合史實，吉朋在註腳中建議：「就文意和語法言，應以 “*deleto*”（意即：摧毀）代之。」他感嘆：「訂正最好的和最差的作者的文字，同樣都是棘手事。」[78]第 19 章描述西元 354 年東帝國財務官蒙休斯（Montius Magnus, d. 354）因冒犯皇帝伽魯斯（Gallus, 351–354 在位），慘遭屠殺的史事。吉朋引據阿

7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22, n. 150.

7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45, n. 33.

7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56, n. 8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亞努斯《羅馬史》，發現阿米亞努斯對蒙休斯性格的描述自相矛盾：

> 阿米亞努斯書中，我們讀到：*Asper*, quidem, sed ad *lenitatem* propensior.（〔他是一個麻煩人物，但多少傾向溫和〕），這些字構成一句自相矛盾的亂語。瓦列西烏斯根據一份古抄本校正了第一字，以 "*vafer*"（按：精明）取代。這個訂正讓我們看到一線曙光。若我們敢於將 "*lenitatem*" 改為 "*levitatem*"（按：輕佻），這一字母的改變使整句清晰、一致。[79]

經過這樣的訂正，蒙休斯的性格變成：「他是一精明的人，但多少有些輕率」，整個文意就豁然貫通了。此外，第 30 章參照卓西莫斯《新羅馬史》，敘述西元 405 年哥德人入侵義大利。吉朋認為這位史家應是將 "*Ἄρνον*"（按：亞諾河 Arno）誤植成 "*Ἴστρον*"（按：多瑙河 Danube）。他在註腳中抱怨：卓西莫斯犯了一個奇怪錯誤，竟把史提利柯的勝利擺在多瑙河以北的地方。[80]

除了文字考訂，吉朋也經常在註腳中處理有關「時間」、「地理」、「數字」等方面的訛誤問題。

塞維魯斯王朝的伊拉伽巴魯斯（Elagabalus, 218–212 在位）在 218 年 5 月 16 日擊敗馬克瑞努斯（Macrinus, 217–218 在位）登上大位，但其死亡日期，因文字記載與紀念章資訊不一致，引發學者的爭論。這一問題之難解，吉朋指出，在於狄翁《羅馬史》說他 222 年 3 月 10 日被弒，在位三年九個月又四日，但這年發行的紀念章又標明是他的第五年護民官。這三個日期兜不攏，引起困擾。《衰亡史》第 6 章處理此一問題，基本上支持狄翁的說法。然而，要如何解釋狄翁說法與紀念章資料的矛盾？吉朋從古典學者瓦爾西奇（Valsecchi）的考訂得到合理解釋：「我們要怎麼回應顯然是真實的紀念章的資訊呢？……我們可根據博學的瓦爾西奇，這樣回答：卡拉卡拉（Caracalla, 211–217 在位）之子翦滅馬克

7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51, n. 23.

8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64, n. 7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瑞努斯之後，即以他父親駕崩日起算自己的即位日。」[81]卡拉卡拉是在217年4月8日被馬克瑞努斯弒殺。

《衰亡史》第7章敘述西元238年2月馬克西明（Maximin, 235–238在位）進軍義大利，抵阿爾卑斯山麓時，遇冬雪融化，河水暴漲，阻礙大軍前進。義大利古典學者穆拉多瑞（Lodovico Muratori, 1672–1750）在《義大利編年史》（*Annali d'Italia*）中，懷疑馬克西明進軍義大利的時間不是2月。他根據希羅迪安的《羅馬帝國史》，指出這年有一個長冬，阿爾卑斯山「融雪」較符合6、7月間。吉朋一向敬重穆拉多瑞的學問，且「一個終生都在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生活的人，提供的意見自然很具分量」。不過，他經過考究後反駁：其一，穆拉多瑞說「長冬」，只見於拉丁文本《羅馬帝國史》，而不見於希臘文原本；其二，希羅迪安提到馬克西明的軍隊遇到太陽和大雨交替的天氣，顯示是春天而非夏天的現象。[82]又，西元359年，波斯人圍攻亞米達城，阿米亞努斯是一手見證者。吉朋依據其《羅馬史》敘述這一史事，發現阿米亞努斯在這一年標出三個自然徵象，但是三者彼此無法完全協調，或不符歷史實況：

> 一、薩普爾（Sapor）入侵美索不達米亞時，穀物業已成熟：「托葉已經變黃」，這個現象，在阿勒坡（Aleppo）的緯度自然應指向四、五月間。二、薩普爾進軍過程中遇到幼發拉底河氾濫。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七、八月間。三、薩普爾歷經73天圍城，攻陷亞米達時，時序已是深秋。[83]

為了調和這些顯然的矛盾，吉朋建議：「我們必須容許波斯王的一些延遲，史家的一些不夠準確，以及季節可能出現失序。」[84]

吉朋重視數字的精確，常在註腳討論「數字」問題。《衰亡史》第5章討論一個羅馬軍團人數，吉朋在註腳指出：塔西佗和狄翁說法不一，

8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48, n. 74.

8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p. 183–184, n. 48.

8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70, n. 64.

8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70, n. 6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者說 9,000 人，後者說 10,000 人。根據利比西烏斯，維提里烏斯（Aulus Vitellius, 西元 69 年在位）時增至 16,000 人，遂為定數：「根據從銘文能掌握的證據，它們邇後不曾再低過這個數字。」[85]第 19 章敘述西元 357 年 8 月史特拉斯堡之戰（Battle of Strasbourg），指出阿列曼尼人（Alemanni）陣亡 6,000 人。關於此一數字，吉朋採信阿米亞努斯，但發現史家說法不一。他在註腳指出：李班紐斯的人數多了 2,000 人，而卓西莫斯則擴大到 60,000 人。吉朋檢視卓西莫斯文本，發現肇因於他誇大阿列曼尼的軍隊：「若非這個輕信或帶偏見的史家，將 35,000 阿列曼尼軍隊，誇大為『無數的蠻族』（πληθος ἄπειρον βαρβάρων），我們可能會將此一誇張的數字，歸諸抄書人無心之過。」這個發現「提醒我們在遇到類似狀況時，須保持適當存疑」。[86]

吉朋偶爾會在註腳中作歷史解釋。《衰亡史》敘述伽列努斯（Gallienus, 253–268 在位）時期（第 10 章），討論到一枚鐫有其頭像紀念章的詮釋問題。這枚紀念章正面是伽列努斯頭像，上面有「奧古斯塔伽列娜」（*Gallienæ Augustæ*）字樣，背面銘文「四海昇平」（*Ubique Pax*）。古文物學者對這枚紀念章感到困惑：伽列努斯頭像上何以鐫有女性名字？且伽列努斯時帝國也不安寧。吉朋在註腳討論此問題，指出紋章專家史班漢主張這枚紀念章乃伽列努斯的敵人所鑄，以諷刺這位女性化皇帝。吉朋認為這一個臆測說服力不足，而在法國古典學者瓦勒蒙（M. de Vallemont, 1649–1721）的一部著作中找到一種他認為較合理的解釋。[87]瓦勒蒙在《羅馬皇帝集傳》的〈三十僭主傳〉（*Tyranni Triginta*）讀到一段敘事：西元 265 年北非守將塞爾蘇斯（Titus Celsus）僭位自立，但第七天即被伽列努斯堂妹伽列娜（Licinia Galliana）所殺。瓦勒蒙推測：

8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03, n. 1.

8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80, n. 85.

87 Pierre le Lorrain Vallemont, Nouvelle explication d'une medaille d'or du cabinet du roy, sur laquelle on voit la Tête de l'Empereur Gallien, avec cette Légende : Gallienae Augustae (Chez Jean Anisson, à Paris 1699) [New explanation of a gold medal from the king's cabinet, on which we see the head of Emperor Gallienus, with this legend: GALLIANE AUGUSTA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伽列娜因對帝國有功，而獲得奧古斯塔尊號，這枚紀念章是為表彰其功績而發行。吉朋認為瓦勒蒙提供一個「巧妙、自然的解決」：合理解釋伽列努斯頭像上何以有「奧古斯塔伽列娜」字樣。這還有先例：法國王室收藏一枚皇帝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r. 121–180）頭像紀念章，頭像上也刻「奧古斯塔芙斯蒂娜字樣」。至於「四海昇平」銘文，吉朋說，可「容易地以伽列努斯的虛榮心來解釋」。[88]

《衰亡史》第 1 章介紹羅馬軍隊，指出羅馬軍團在戰場上除了常規武器，也使用投石機，「以無比的威力投射石彈或標槍」。吉朋在註腳中解釋羅馬軍隊越來越倚賴戰爭機械的原因：「我們可這樣觀察：在羅馬帝國，隨著個人武勇和戰鬥技藝的逐步衰退，戰場上使用機械的情況隨著逐步增加。當人力枯竭時，其位子便由機械取代。」[89]透過此一解釋，吉朋似乎迂迴地將戰爭機械的使用與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做連結。當羅馬軍團開始倚賴戰爭機械，反映的是羅馬兵源的枯竭與社會尚武精神的衰退，在吉朋看來，這正是羅馬帝國衰亡的重要因素。

四、間接顯示書寫筆法

在《衰亡史》中，吉朋對特殊的人物、事件、習尚等，常不吝表達自己的評論。吉朋的歷史書寫，除了重視敘事精確，也強調修辭的文雅。在書寫過程中，若覺得有必要表達個人態度，通常會在正文先以隱晦手法作文雅的陳述，再在註腳中引證事實，明白傳達他的立場或好惡。用心的讀者，常可在他的註腳遇到一些幽默評論，而會心一笑。

（一）諷喻（Irony）

吉朋的筆力高明，擅長以諷刺筆法品評歷史人物，嘲諷的對象包括

8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74, n. 171.

8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5, n. 6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人物、教會人士與學者等。[90]在《衰亡史》中，第一個被嘲諷的人物是羅馬帝制的肇造者：「第一公民」奧古斯都（Augustus, 27 BCE–14）。

《衰亡史》第 1 章敘述奧古斯都外交政策的轉變。奧古斯都奪取政權後，鑑於羅馬的擴張已達國力極限，而國家在長年內戰後也需休養生息，於是在外交上改採和平政策，相信可以透過勸服取得蠻族讓步，保障羅馬的安全和尊嚴。吉朋寫道：「他透過一紙光榮的條約，不用讓自己和軍團再暴露於帕息亞人（Parthian）箭雨下，成功取回克拉蘇戰敗時落入敵手的軍旗與戰俘。」[91]奧古斯都將此列入個人的重要勳業，在安塞拉記功碑（Monumentum Ancyranum）寫道：

> 征服敵人之後，我從西班牙、高盧、達爾馬提亞人手中，收回許多其他將軍失去的軍旗。我迫使帕息亞人歸還三個羅馬軍團被擄的物品和軍旗，並哀求羅馬人民的友誼。我將這些軍旗安放在戰神神殿的內殿。[92]

記功碑文字讀起來像是奧古斯都「親自」領軍擊敗帕息亞人，取得戰果。但吉朋在這裡下一註腳：「奧古斯都在記錄自己功勳的安塞拉記功碑中硬說：***他迫使***帕息亞人歸還克拉蘇的軍旗。」[93]

這是《衰亡史》第一個註腳，吉朋透過巧妙的文字操作，展現高明

---

90 有關吉朋在教會議題上使用反諷，參見 Frank Palmeri, “The Satiric Footnotes of Swift and Gibb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1, no. 3 (Autumn 1990, Philadelphia), pp. 245–262.

9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

92 安塞拉記功碑《奧古斯都功業錄》第 29 項：“From Spain, Gaul, and Dalmatians, I recovered, after conquering the enemy, many military standards which had been lost by other generals, The Parthians I compelled to restore to me the spoils and standards of three Roman armies, and to seek as suppliants the friendship of Roman people. These standards I deposited in the inner shrine which is in the temple of Mars Ultor.” Velleius Paterculus,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The Res Gestae of Augustus),* trans. Frederick W. Ship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art 5, chapter 29.

9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 n. 1. “The marble of Ancyra, on which Augustus recorded his own exploits, asserts that *he compelled* the Parthians to restore the ensigns of Crassu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嘲諷功力。吉朋沒有明文揭發奧古斯都的虛榮，只是把記功碑中「他迫使」幾字以斜體呈現，透過語氣的加強，文雅地表示反諷。究實而言，吉朋認為記功碑「他迫使」的說法不精確。西元前 20 年，羅馬宿敵帕息亞內爭，奧古斯都派繼子泰比留斯前往調解。泰比留斯透過軍事威嚇和外交手段，讓帕息亞屈服，並歸還重要信物。這實際上是泰比留斯的功蹟，但奧古斯都卻攬為己功。

吉朋對奧古斯都的批評不止於此，他除了諷刺奧古斯都的虛榮外，更揭露他政治上的虛偽。吉朋在第 3 章敘述順服的元老院逐步授予奧古斯都各項大權，甚至給予終身執政。吉朋在此下一個註腳：

> 奧古斯都九度連任執政，沒有間斷。然後，他非常機巧地拒絕延任執政與獨裁官之職，並即離開羅馬，然後等待，直到城內的暴亂與派系傾軋造成致命後果，逼使元老院授予他終身執政。[94]

這個註腳揭穿了奧古斯都取得終身執政，是一樁精心設計的政治操作。他在連九任執政後，假裝還政元老院，再放任士兵暴亂，迫使元老院不得不授予他終身執政之位。字裡行間，吉朋對奧古斯都的心機大加嘲諷。在他筆下，奧古斯都是個工於心計的統治者，並一再被形容為「狡詐的僭主」[95]、「手段高明的君王」[96]、「有手腕的建基者」[97]、「機巧的僭奪者」[98]、「奸巧的僭主」[99]。

《衰亡史》不乏類似諷刺皇帝的例子。西元 357–359 年，朱里安升任凱撒，在高盧擊潰法蘭克人和阿列曼尼人，聲望陡昇（第 22 章）。皇帝康士坦修意圖攬為己功，向各省發出信函，內容說：「康士坦修親自部署軍隊；他身先士卒，展現英勇；他的軍事作為確保勝利；而蠻族國王在戰場上被俘，呈獻給他。」信函刻意略去朱里安的名字。然而吉朋

9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65, n. 16.

95 Gibbon, “The Crafty tyrant,” i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61.

96 Gibbon, “That artful prince,” i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66.

97 Gibbon, “the artful founder,” i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70, n. 24.

98 Gibbon, “that artful usurper,” in *Decline and Fall*, vol. 7, p. 180.

99 Gibbon, “that subtle tyrant,” i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8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嘲笑說，實際上會戰當時康士坦修本人尚在 40 日行軍日程之外！[100]另一個實例是諷刺皇帝周維安虛構戰功、自我吹噓。西元 363 年朱里安在對波斯戰爭中死亡，軍隊擁立周維安為帝。《衰亡史》第 25 章提到：當時帝國陷入危機，軍隊疲憊不堪。周維安為了安全撤軍，與波斯簽訂了一紙「不光彩的、或許是必要的條約」。在「不光彩的、或許是必要的條約」後面，吉朋下一個註腳：「周維安的紀念章，刻了勝利、桂冠和伏匍的戰俘等圖像，來粉飾他的作為。阿諛奉承乃是一種愚蠢的自殺；他用自己的雙手毀了自己。」[101]

其次，吉朋經常嘲諷基督教會長久以來存在的「奇蹟」（miracle）說。他發現基督教的聖徒們幾乎都不曾提到自家身上的奇蹟，而多是源自其友人或門徒間的傳述。《衰亡史》第 15 章寫初期教會的奇蹟，指出其流傳有一定模式。吉朋在註腳中舉聖徒克萊沃的柏納（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為例：

> 多少有點讓人感覺奇特的是，克萊沃的柏納記錄了他的好友聖馬拉奇（St. Malachi, 1094–1148）的許多奇蹟，卻從未注意到自己的。不過，他個人的奇蹟輪由他的友人和門徒仔細的講述了。[102]

吉朋這裡意在諷刺教會的「奇蹟」大都純屬虛構：「在長遠的教會史上，有任何一位聖徒斷言自己擁有奇蹟能力嗎？」[103]另一個例子中，吉朋嘲笑一種另類奇蹟：「優納比烏斯（Eunapius, 347–414 之後）筆下的哲學家演示了與沙漠的聖徒們一樣多的奇蹟，唯一有利他們的情景是其較不那樣幽闇。楊布里庫斯（Iamblichus, 245–325）捨棄帶角和尾巴的魔鬼，從兩個接連的噴泉召喚出兩個愛的守護神：伊羅斯（Eros）和安提羅斯（Anteros）。兩個美麗的男孩從水中生出，擁抱他作父親，然後聽他的

10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97.

10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 n. 1.

10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0, n. 82.

10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0, n. 8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令退下。」[104]

《衰亡史》第 20 章敘述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基督教，提到教會史家優西比烏斯一個「非常奇特的證辭」：君士坦丁進軍羅馬時，親眼看見一個十字架的異象，上有「經由這次征服」字樣。這個神奇經驗堅定他的改宗決心。[105]吉朋的註腳討論此一問題：

> 第 4、5 世紀的教父們，在浩繁的著作中，一再歡慶教會和君士坦丁的勝利。但是，此一異象的辯護者，卻無法從其中找到任何一個見證，證明其事。由於這批令人尊敬的學者並不厭惡奇蹟，我們可以懷疑（此一懷疑可由聖日羅莫對其一無所知獲得確證），他們都不知道有優西比烏斯《君士坦丁傳》這本書。這本小書乃是那些翻譯或續寫優西比烏斯《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並活靈活現地陳述十字架異象者，努力辛勞重新發掘的。[106]

吉朋認為記載此異象的《君士坦丁傳》應屬偽作，而整個故事純屬虛構。在第 23 章，吉朋在一個註腳中提到教會作者納濟安真敘述朱里安身上一個奇蹟：「朱里安陷入瞬間恐慌時，就畫十字架符號，魔鬼立即消失無蹤。納濟安真認為魔鬼是受到驚嚇，其他教士則說他們是憤怒。讀者諸君可根據自己的信仰尺度，來裁斷此一深奧的問題。」[107]吉朋此處也是反諷教會作者納濟安真的記述乃是無稽之談。

吉朋建構羅馬帝國史時，16 世紀以來歐洲古典學者的研究成果是他的重要依據。《衰亡史》一書徵引的近代古典學者，人數超過 400 人，包含法國、英國、德國和義大利人。[108]但是，在引用古典學者的研究之餘，吉朋也不時嘲弄這些學者的賣弄學問或鑽牛角尖。

---

10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39, n. 22.

10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p. 304–305.

10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05, n. 52.

10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40, n. 24.

108 I. W. J.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no. 37 (January 1939, Oxford), p. 8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衰亡史》第 12 章提到《羅馬皇帝集傳》的〈奧瑞連傳〉記載：奧瑞連致信元老院，答允由皇家財庫支付祭神慶典，以換取元老院打開神廟，讓他卜問軍事行動命運。奧瑞連還說：“Est præterea vestræ auctoritatis arca publica.” 意即：「何況，你們手中還掌控國家財庫……」，吉朋認為皇帝這句話承認元老院保有財政權，並無疑難之處，卻還有學者執意考據一番。他在註腳中諷刺：「這句話完全清晰，但卡紹本（Isaac Casaubon, 1559–1614）和撒爾馬修（Claudius Salmasius, 1588–1653）還要考訂一番。」[109]同一章介紹羅馬人在鬥獸場舉辦鬥獸會，吉朋在註腳中抱怨：「關於這些鬥獸會舉行的時間，史卡利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 1484–1558）、撒爾馬修和丘柏（Gisbert Cuper, 1644–1716），都花費很大力氣，把一個原本甚清楚的課題，反而考訂得模糊不清。」[110]

《衰亡史》第 30 章敘述西元 5 世紀初年高盧邊境的安寧時，引證克勞狄安〈執政史提利科頌〉一詩，描述高盧牛群在「Albis」（按：Elbe 易北河）放牧的情景。法國杜波神父（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在《古代詩歌與繪畫考證》（*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ësie et sur la peinture*）中，卻對克勞狄安詩中的「史實」大加考證。吉朋在註腳中批評：

> 杜波神父在《古代詩歌與繪畫考證》中作考證，執意以 “Alba” 一字（亞爾丁森林一條無名小溪）來替代 “Albis” 這字。他不厭其煩論說：高盧牛群趕到易北河以東放牧，實在太危險。真夠愚蠢！詩歌中的地理，易北河和赫辛尼亞林地（the Hercynian），可象徵日耳曼境內任何一條河流、任何一塊森林。克勞狄安還沒準備接受我們考古學者的嚴格考究呢！[111]

此外，史卡利格和撒爾馬修也大費周章，爭辯義大利南部希臘殖民地「丘瑁」（Cumae）的起源問題。對吉朋來說，一個西元 2 世紀已然荒廢的

10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22, n. 15.

11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46, n. 106.

11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70, n. 91. Hercynian Forest 在古代萊茵河以東的南德一帶，西與 Black Forest 為鄰。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希臘殖民地，實無太大爭論價值：「我留交史卡利格和撒爾馬修去爭論丘瑁的起源吧！此一希臘人在義大利的最早殖民地，在詩人朱文諾（Juvenal, 活躍於 2 世紀早期）的時代就已杳無人煙，現在更只是廢墟一片。」[112]

有些學者治學不嚴謹，常作缺乏事實根據的論斷。《衰亡史》第 1 章介紹羅馬帝國疆域，談到北非地區。吉朋在註腳中批評啟蒙泰斗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無事實根據或可能性支持下，「慷慨將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送給羅馬帝國」。[113]第 19 章提到羅馬的「底貝安軍團」（Thebaean legion），吉朋覺得有確鑿證據支持此軍團的存在：底貝安軍團駐紮在哈德良堡（Hadrianople），曾派代表團晉見皇帝伽魯斯，而《帝國職官錄》也提到三個底貝安軍團。可是，吉朋說，伏爾泰出於一種意圖破壞某種可鄙神話的「激情」，竟在「證據薄弱的情況下，否認羅馬軍隊中有底貝安軍團」。[114]《衰亡史》第 6 章核算羅馬行省總歲入，吉朋指出在 1,500 萬到 2,000 萬英鎊之間，但他查閱古典學者利比西烏斯《論羅馬的偉大》（*de magnitudine Romana*），發現這位學者居然算出 1 億 5,000 萬金克朗。吉朋在註腳諷刺：「他整本書雖然非常博學和有識見，卻透露一種非常炙熱的想像。」[115]

（二）隱諱

吉朋對於「性」的議題，尤其是有關宮闈或教會的性事，抱持好奇心。他書寫《衰亡史》時，偶爾會穿插一些與「性」有關的故事。第 4 章一段哲學家皇帝奧理略「戴綠帽」的橋段，是經典實例。

吉朋敘述奧理略皇帝性情溫文儒雅，認為這是他個性的敦厚之處，但也是最大缺陷：「他寵愛自己兄弟、兒子和妻子，超過私人美德界線，

11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4, p. 419, n. 75.

11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6, n. 95.

11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52, n. 26.

11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60, n. 11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成公共傷害。」吉朋接著說：皇后芙斯蒂娜（Faustina, c. 130–175/176）以美貌出名，卻也花名在外，「這位哲學家的嚴謹樸素，罩不住她的輕佻多情，或滿足她渴望變化的激情」。為了滿足慾望，她常從最低賤的人中「發掘其個人長處」。但是，奧理略對芙斯蒂娜的越軌行為似乎一無所知，並且「始終如一向她表明最深摯的信心」：

> 在《沉思錄》（*Meditations*）中，馬可斯感謝上天，賜給他一個賢妻，如此忠誠，如此柔順，如此質樸。諂媚的元老院在他請託下還宣告她為女神，下令青年男女結婚時必須在這位貞潔守護女神面前立下誓約。[116]

吉朋在引用《沉思錄》後，下了一個註腳：

> 世人都在竊笑馬可斯的輕信，但是達西爾夫人（Madame Dacier）向我們保證（而我們可以信任一位女仕），如果妻子放軟姿態刻意要掩飾，丈夫多半是會受騙的。[117]

達西爾夫人（Madame Dacier; Anne Le Fèvre Dacier, 1647–1720）是法國女古典學者，吉朋熟悉她的著作。他引達西爾夫人身為女性的說法，替奧理略輕信皇后貞潔一事辯解。

在 18 世紀的文雅社會，性議題的書寫仍有一些忌諱，在橋段安排或文字技巧上，都須慎重其事。吉朋是一名典型的紳士學者，他的預設讀者是英國上流時尚社會，期望他的書能夠擺進仕女的梳妝間，因此《衰亡史》在「性」議題的處理上極為謹慎。吉朋敘述與性相關的情節時，正文儘量求其文雅，而將一些露骨的敘事隱藏在註腳中，甚至躲進拉丁文或希臘文裡。例如，上文所謂皇后芙斯蒂娜「常在最低賤的人等中發掘其個人長處」，所指為何？吉朋在註腳中引證《羅馬皇帝集傳》的記載，揭開真相：「芙斯蒂娜在蓋伊塔（Caieta）時，常在水手和角鬥士中，為自己挑選愛人。」[118]對比羅馬皇后的放蕩，《衰亡史》第 11 章敘述西

11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p. 83–84.

11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84, n. 5.

11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83, n. 3. “Faustinam satis constat apud Cayetam,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 260 年羅馬帝國與敘利亞帕爾米納（Palmyra）的戰爭，寫到帕爾米納王后珍諾比雅（Zenobia, c. 240–274）的英武與豪邁。吉朋稱讚這位女強人「美貌不下於先祖克麗奧佩特拉（Cleopetra, 51–30 BCE 在位），貞節與自律則有過之」。他也在註腳中用一個故事來凸顯珍諾比雅的自律：「除非是為了生育後代之需，她從不允許丈夫的親熱。如果她的期待（按：懷孕）受挫，就會在次一個月再試驗一次。」[119]

在《衰亡史》第 9 章，吉朋以日耳曼婦女的單純、勤勞與貞潔，來對照羅馬女性的享樂與放蕩。他以西元 1 世紀詩人歐維德(Ovid, 43 BCE–17/18）《求愛的技藝》（*Ars Amatoria*）一書，來說明古羅馬婦女享樂的風氣。在註腳中，吉朋提到歐維德教年輕人如何在羅馬獵豔：「歐維德用兩百行詩句，找尋最佳的求愛場所。他認為在所有場所中，劇場是最適合撿拾羅馬美女、將其融化為纖柔和淫蕩之處。」[120]歐維德的建議有實際基礎。《衰亡史》第 3 章寫到五賢帝之一庇烏斯（Antoninus Pius, 138–161 在位）時帝國的「秩序與安寧」，吉朋繼而說到這位溫文皇帝的私生活：他適度享受「財富帶來的便利」與「社交生活的愉悅」。在這裡，吉朋在註腳中說庇烏斯喜歡劇場：「他愛好劇場，且對女性的風韻不是完全無感。」[121]

吉朋甚至須把一些性議題的露骨陳述，隱藏在註腳的拉丁文或希臘文裡。《衰亡史》第 4 章敘述康莫德斯（Commodus, 161–192）的荒淫無道：這位皇帝沉溺聲色犬馬，後宮養了各省、各階層選送的美女與美少男各 300 人；這位獸性愛人若誘引不成，就徑行使用暴力。吉朋指出：「古代歷史家詳述這些荒淫行徑，但要將這些太過忠實的描述譯成高雅

---

conditiones sibi et nauticas et gladiatorias, elegisse." (Faustina, while at Caieta, used to choose out *lovers* for herself from among the sailors and gladiators.)

11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02, n. 62.

12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27, n. 58. 參見 Ovid, *The Art of Love and Other Poems,* trans. G. P. Good and J. H. Morz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Book 2, parts 2–8.

12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77, n. 5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現代語文，並非易事。」[122]他在註腳中，引用《羅馬皇帝集傳》原文，揭露康莫德斯的荒淫行徑：

> Sororibus suis constupratis. Ipsa concubinas suas sub oculis msuis stuprari jubebat. Nec irruentium in se juvenum carebat infamiâ, omni parte corporis atque ore in sexum utrumque pollutus.[123]

只有上流的文雅讀者才可能理解這段拉丁文：「他玷污自己親姐妹，又讓自己的嬪妃在他眼前任人玷污。他還丟人現眼與年輕人有親密行為。他在和兩性的接觸中，弄髒身體和嘴巴每一部位。」讀懂這段文字，就能理解吉朋何以選擇把拉丁原文隱藏在註釋裡了。《衰亡史》第 18 章，吉朋委婉地指責康士坦斯（Constans, 337–350 在位）的「戀童癖」。正文寫道：康士坦斯很高傲，然既無赫赫軍功，又乏能力和勤奮，令人瞧不起。「他特別鍾愛一些日耳曼俘虜，其唯一特質是散發年輕的魅力，遭到人民的物議。」在註 72 中，吉朋引用史家維克特《羅馬皇帝簡史》的一段拉丁文評論：

> Quarum (gentium) obsides pretio quæsitos pueros venustiores, quod cultius habuerat, libidine hujusmodi arsisse pro certo habetur.
>
> 〔中譯：因他過於熱衷從他們取得人質，更確切說，是他設法求得和買來的迷人男童，有理由相信他內心燃燒著這種激情。〕

「這種激情」即是指「戀童癖」。吉朋接著說：若不是康士坦斯公然展示此一墮落品味，史家維克特「也不會以如此明確的文句，寫下這一斷語」。[124]

《衰亡史》第 24 章敘述西元 363 年朱里安進軍敘利亞，談到敘利亞自古以來民風腐化與墮落。吉朋先引羅馬史家撒魯斯特（Sallust, 86–c. 35 BCE）對安提阿的批評：「沒有比那個城市的習慣更墮落的了。」他繼而引柯西烏斯（Q. Curtius, 西元 1 世紀）的觀察：「巴比倫的熟女和年

12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92.

12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92, n. 31.

12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32, n. 7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輕處女，在放浪的酒宴上，無拘束地和男人廝混。在醇酒和愛慾迷醉後，她們逐漸、幾乎完全去掉累贅的衣裳。」並引柯西烏斯的原文為證：“ad ultimum ima corporum velamenta projiciunt.”（最後她們去掉最私密的衣物）。[125]同一章，吉朋敘述朱里安在敘利亞如何抗拒誘惑，以維持個人純貞。他在註腳中引用阿米亞努斯的紀錄：

> Ex virginibus autem, quae speciosae sunt captae, ut in Perside, ubi feminarum pulchritudo excellit, nec contrectare aliquam voluit nec videre. Ammian.
>
> 〔（朱里安）擄獲很多閨女，她們都很美貌。這在波斯稀鬆平常，那兒的女人在這一點上勝出。但是，他卻一個都不願去碰觸或看一眼。〕

有趣的是，吉朋在這裡加了一句按語：「波斯在地人又矮又醜，但後來不斷和高加索種混血，已經大有改變。」這個暗語，不知只是在講一個事實，或者是在暗諷朱里安的虛偽？[126]

下一個故事更露骨。西元 280 年，高盧的羅馬將領柏諾蘇斯（Bonosus, d. 280）和普羅庫魯斯（Proculus, d. 281）叛變。吉朋敘述兩位叛將時（第 12 章），特別提到其「英勇」事蹟：「那兩位軍官最凸出的長處，是其個別的英勇表現：一個展現在巴庫斯（Bacchus）戰鬥，另一個表現在維納斯（Venus）戰鬥。」[127]在古典文學中，巴庫斯是酒神，而維納斯是愛神。吉朋這裡意在嘲諷兩位叛將，雖然不乏勇氣和能力，卻一個好酒，一個好色。「維納斯」可引申為「性、慾、性交」等意涵，吉朋在文雅地提到普羅庫魯斯的「維納斯戰鬥」時，特別下一個註腳，引用《羅馬皇帝集傳》一個有趣記載：

> 一個非常令人驚奇的例證，記錄了普羅庫魯斯的英勇。他曾擄獲一百名撒馬息安人的處女，其餘的故事必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Ex his unâ nocte decem inivi: omnes tamen, quod in me erat, mulieres intra

12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500, n. 63.

12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500, n. 64.

12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3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dies quindecim reddidi."[128]

普羅庫魯斯這段話，中譯是：「這些處女中，我單單一個晚上就睡了當中十個；無論如何，只要在我的能力內，我在十五天中就讓她們全都變成女人。」

羅馬當局還有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衰亡史》第 16 章敘述羅馬政府刁難猶太人，吉朋在註腳中引用蘇東尼烏斯〈多米提安傳〉的記載：蘇東尼烏斯曾看到一位 90 歲的老人，在羅馬稅務官法庭前當眾接受檢查是否割包皮。「這就是馬爾修（Martial, 38 至 41–102 至 104）所說："Mentula tributis damnata."（連割包皮的陰莖都要課稅！）」[129]《衰亡史》第 5 章敘述禁衛軍統領權力擴張，提到賽維魯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 在位）愛將普勞提亞努斯（Plautinus, c. 150–205）濫用皇帝權柄。吉朋在註腳中引狄翁《羅馬史》一則普勞提亞努斯的荒唐行徑，來支持其論斷：「他最膽大妄為、荒唐的濫權之舉，是把三百位羅馬自由民去勢，他們有的已婚，有的甚至是一家之長。而這只是為了他女兒下嫁年輕皇帝時，可像東方皇后那般有一行的太監隨伺。」[130]

統治階層的性放蕩之外，吉朋也常嘲弄基督教「聖徒禁慾」問題。吉朋寫道，基督教神學中，性慾（desire）被視為一種罪，而婚姻則被當作是一種受到容忍的缺陷。從這個原則出發，教會主張禁慾（獨身）是最接近神性的完美境界，故在初始教會中，大批善男信女決意終身保持貞潔。寫到這裡，吉朋指出一些聖徒為壓抑性慾以保持聖潔，而採用一些極端的作法。例如，亞歷山卓的希臘教父聖徒奧瑞根（Origen of Alexandria, c. 185– c.253）：「有些人，我們可計入學問淹博的奧瑞根，為此非常慎重地卸除了誘惑之根（disarm the tempter）。」[131]吉朋在註腳中說明：

12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35, n. 58.

12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90, n. 47.

13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23, n. 70.

13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7. "A few of these, among whom we may reckon the learned Origen, judged it the most prudent to disarm the tempte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奧瑞根的聲望引發嫉妒和迫害之前，此種駭人聽聞的舉動受人仰慕，而非責難。由於他過去習慣用寓言方式來詮釋《聖經》，但這一回，不幸的，他居然按其字面的意義來做。[132]

吉朋何以說「卸除那誘惑之根」是駭人聽聞之舉？因為奧瑞根為一勞永逸截斷性衝動的根源，居然真的閹割自己的性器官，而非只是作象徵性的動作。

《衰亡史》第 15 章，吉朋引用《殉道傳》（*Acta Sincera Martyrum*），敘述羅馬政府以一種奇特的「懲罰」手段，來折磨虔誠的女性信徒，以迫其選擇要堅持信仰或者保持貞潔。法官派來年輕壯漢，令其放浪地裸擁這些虔信的貞女，「盡最大的力氣以保持維納斯的榮耀」。[133]寫到這裡，吉朋另在註腳中引用聖日羅莫《保羅隱士傳奇》（*Legend of Paul the Hermit*），指出一種類似的懲罰：「《保羅隱士傳奇》講一個奇特故事：一個年輕人赤身裸體地被鍊在一張擺滿鮮花的床上，受到一位美麗、淫蕩的高級妓女的性攻擊。這位年輕人竟咬斷舌頭，以壓制不斷上升的誘惑。」[134]

五、史家的臧否

在撰寫《衰亡史》時，吉朋也經常利用註腳，來論斷古今史家的優劣。在古代史家中，塔西佗是他最心儀的史家，而阿米亞努斯和卓西莫斯則是他引用最多的史家。

---

13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37, n. 97. “As it was his general practice to allegorise Scripture, it seems unfortunate that, in this instance only, he should have adopted the literal sense.”

13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96.

13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96, n. 6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古代史家

吉朋在青年時的處女作《論文學研究》（*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1764）中曾說：「塔西佗是我所知的作家中，唯一符合我觀念中這樣的一位哲學的歷史家（philosophical historian）。」[135]在《衰亡史》中，吉朋讚美塔西佗的《編年史》努力收集資料、處理問題，將 40 年的羅馬歷史寫成不朽史作，書中「每一句都充滿著最深刻的觀察和最生動的描述」。[136]這一位哲學的歷史家一直是吉朋心目中理想史家的典範。

《衰亡史》第 10 章討論日耳曼民族早期歷史，即主要依據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Germinia*）。敘述達西亞省邊境的族群時，吉朋指出這個地區日耳曼人與撒馬提安人（Sarmatians）混雜日久，連塔西佗都感到辨識不易：「在那個邊境，血統與風俗混雜，令甚至最精確的歷史家都感到迷惑。」塔西佗這樣寫道：「挹契尼人（Peucini）、維內提人（Veneti）和芬尼人（Fenni）究竟應當算在日耳曼人之內，還是應當歸之撒馬提安人之列，這是很難斷定的。」[137]吉朋在註腳中贊許塔西佗治史的審慎態度：「塔西佗無疑地應該得到那個頭銜（即：精確的史家），即便他審慎保持懸而不決，也證明他費心作過探究。」[138]這種態度也反映在塔西佗處理「羅馬大火」一事。《衰亡史》第 16 章敘述西元 65 年羅馬大火，當時謠傳尼祿（Nero, 54–68 在位）縱人放火焚毀羅馬城，還「堅信尼祿觀賞自己引發的災禍，邊彈七弦琴，邊唱古代特洛伊城毀滅的故事」。[139]關於這個傳言，吉朋在註腳中指出，蘇東尼烏斯積極地抄錄，而狄翁更是嚴正確認。然而，「我們會看到，塔西佗以一種恰當的

135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4), p. 107.

13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87.

137 塔西佗著，馬雍、傅正元譯，《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 79。

13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244, n. 30.

13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8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信任和遲疑，提及此一傳聞」。[140]

塔西佗的史著未完整傳世。吉朋在敘述到塔西佗曾寫過的片段時，常因無法引述塔西佗的敘事而感慨：「實在令人遺憾，塔西佗敘述那一事件的部分業已佚失。我們只能遷就約瑟法斯（Flavius Josephus, 37–93 後）的流行傳聞，及狄翁與蘇東尼烏斯不完整的蛛絲馬跡。」[141]在吉朋眼中，約瑟法斯、狄翁與蘇東尼烏斯等人，無法與塔西佗相提並論。西元 472 年，羅馬化西哥德軍人瑞西莫（Flavia Ricimer, 456–472）攻陷羅馬。《衰亡史》第 36 章敘述瑞西莫蹂躪羅馬時，吉朋找不到可用史料作為依據，決定借用塔西陀《歷史》（*Historiae*）中西元 69 年帝國內戰時維斯帕西亞努斯（Vespasianus, 69–79 在位）攻陷羅馬的景況來模擬。吉朋下一個註腳：「羅馬城受到維斯帕西亞努斯軍隊的攻擊時，呈現這種情況：城中隨處可見可怕而又可憎的景象，」並感嘆：「從那時以來，每一項災難的原因已大增力道。幾個世紀的循環或許帶來同樣的災難；但幾個世紀可以循環，卻沒有再產生另一個塔西陀來給予描述。」[142]

塔西佗是吉朋在史學上的精神導師。但是塔西佗的《編年史》和《歷史》涵蓋西元 1 世紀羅馬帝國早期，吉朋可引用的機會不多。古代史家中，吉朋經常引用的是阿米亞努斯《羅馬史》和卓西莫斯《新羅馬史》，不過吉朋對兩位史家的評價差別極大。

阿米亞努斯撰寫《羅馬史》，始於西元 96 年，截筆於 378 年哈德良堡之役（Battle of Hadrianople）。阿米亞努斯意圖接續塔西佗，完成羅馬帝國史寫作：塔西佗《歷史》結束於西元 96 年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 81–96 在位）被刺。和塔西佗兩部史書一樣，《羅馬史》也未能完整保存。吉朋在《衰亡史》第 26 章的一個註腳說明這部史書現況：《羅馬史》共 31 書，「前 13 書浮面簡述頭 257 年的史事，業已佚失；後 18 書只涵

14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84, n. 30.

14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72, n. 30.

14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4, p. 45, n. 11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蓋 25 年，保存他那個時代豐富、真實的歷史」；[143]留傳的 18 書，涵蓋了西元 353 年到 378 年的羅馬帝國史。

西元 4 世紀末、5 世紀初，羅馬帝國歷經戰亂，史料大都散逸，《羅馬史》由是成為有關 4 世紀後期羅馬史的珍貴史源。吉朋書寫《衰亡史》時引用此書達 350 次，從第 16 章起，即大量引述。

西元 354 年，駐東方的僚帝伽魯斯（Gallus, 351–354 在位）殺害皇帝康士坦修的使臣，招致殺身之禍。吉朋敘述此事時，在註腳中說明史源：「我們現在進入阿米亞努斯《羅馬史》敘事最完整的部分，且只須引述第 14 書 7 到 9 章，而毋庸再從各種不同史料摳集零散、殘缺的蛛絲馬跡。」[144]對他來說，有了《羅馬史》可作依循，其他的零散資料就顯得無足輕重。西元 378 年，羅馬軍隊在哈德良堡被哥德人擊潰，損失慘重。《衰亡史》第 26 章寫到這裡，在註腳中檢視相關史源：

> 這些作者提供一些模糊的證據：聖日羅莫的《書信集》（*Epistolae*）和《年鑑》、維克特的《羅馬皇帝簡史》、歐羅修斯的《反異教史》、周南德斯的《哥德人史》、卓西莫斯的《新羅馬史》、蘇克拉提斯的《教會史》、蘇佐門的《教會史》、伊達修斯（Idatius, 400–469）的《年鑑》（*Chronicle*）。

儘管有這些史料，吉朋卻認為，「這些證據加總起來，和阿米亞努斯一個人相較，實在是輕微的、脆弱的。」[145]

阿米亞努斯是西元 4 世紀重要史家，刻意師法塔西佗。吉朋覺得其文采、史識雖不及塔西佗，但敘事基本上客觀公正，稱讚他是一個「明智、公正的史家」，「敘述忠實，不偏不倚」。[146]《衰亡史》第 22 章敘述朱里安施政兢兢業業，常「擔任演說家與法官雙重角色」。吉朋在註腳中討論他司法方面的評價：

---

14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n. 116.

14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251, n. 24.

14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13, n. 96.

14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3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阿米亞努斯公正陳述他的司法程序的優點與缺點。李班紐斯只看到好的一面，他的描述雖在奉承朱里安，但至少講出他的法官責任。納濟安真則壓下叛教者的美德，而誇大他其實甚輕微的過失。[147]

相對於李班紐斯和納濟安真的偏見，阿米亞努斯秉持了公正的精神。

阿米亞努斯自然也有不足之處。吉朋曾經批評其文筆有時不清：「阿米亞努斯文筆實在拙劣，以致難以區別所說是事實或隱喻。不過，他確定他在希臘波羅奔尼撒半島的墨東（Methone），在距海岸兩哩遠處看到一艘腐爛船殼。」[148]吉朋甚至懷疑他也可能會捏造證據：「阿米亞努斯說，在這封公開信件之外，他增加了一些充滿責難與怨恨的私人信函。這些私人信函，這位史家從未見過，也不可能出版過。它們也許根本不曾存在過！」[149]然而，這些瑕疵並不影響吉朋寫作時對他的倚賴。西元 378 年 8 月，皇帝瓦倫斯（Valens, 364–378 在位）戰死於哈德良堡，《衰亡史》第 26 章寫此一史事，最後一次引用《羅馬史》。吉朋在註腳中表示他的遺憾：

> 人們或許會指責他的文筆有種種缺陷，或他的敘述雜亂無章；但現在我們必須告別這位客觀公正的史家，對此一無法挽回的損失深感遺憾，不忍心再予苛責。[150]

之後，吉朋又在正文中表達相同的情緒：「我感到最誠摯的遺憾，現在必須向一位準確與可靠的嚮導告別。他撰寫他的時代的歷史，卻未帶有通常會影響那個時代人的種種偏見與激情。」[151]

吉朋告別阿米亞努斯時說，這位史家將「下一個更光輝朝代的書寫，推薦給富朝氣與雄辯的後起之秀」。[152]吉朋在註腳中點名：「東

14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29, n. 85.
14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69, n. 1.
14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04, n. 17.
15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11, n. 93.
15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15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在下個世紀出現幾位擅長辭藻的史家：卓西莫斯、奧林匹歐多魯斯（Olympiodorus, 380–425 之後）、馬爾庫斯（Malchus, 5 世紀）、甘狄杜斯（Candidus, 430 年代–491 後）等。」[153]阿米亞努斯曾告誡史家勿降低以真實為目標的史著之品質，並期許「年富力壯、學識淵博的新秀，若選擇此一工作，應以更高尚的風格來寫作」。[154]可惜，吉朋感嘆說，這批後起之秀「並未接受他的建議，或摹仿他的榜樣」。[155]換言之，阿米亞努斯以後的拜占庭史家寫史時，對文字修辭的講求，超過了對歷史真實的關注。

卓西莫斯活躍於西元 490 到 510 年間，是 5 世紀史學新秀中的佼佼者。他的《新羅馬史》涵蓋奧古斯都時期到西元 410 年西哥德人攻陷羅馬。[156]這是阿米亞努斯的《羅馬史》之外，吉朋最倚賴的一種史源。

然而，在吉朋眼裡，卓西莫斯並不是優秀的史家，史才與史識遠不如阿米亞努斯。吉朋在引證卓西莫斯時，常同時在註腳裡提出批評。吉朋抱怨卓西莫斯常敘事不完整，還須「藉助殘缺史料與編年紀事中的蛛絲馬跡、詩歌或頌辭的比喻文字、教會作者不可靠的協助，來洞照卓西莫斯不完整的敘事」。[157]《衰亡史》第 11 章敘述西元 267 年帕爾米拉（Palmyrene Kingdom）國王奧登納塔斯（Odenathus, 263–267 在位）在狩獵時與姪子梅翁尼烏斯（Maeonius, d. 267）發生爭執，遭到刺殺：

> 佐拉納斯（Johannes Zonaras, 12 世紀）的敘事清晰，也具可能性；《羅馬皇帝傳》和卓西莫斯的敘事混亂，也欠一致性；辛謝魯斯（Syncellus, d. 810）的敘事，除非是訛誤，全然不知所云。[158]

第 26 章敘述西元 386 年狄奧多修皇帝擊敗東哥德。吉朋檢視史家記載，認為卓西莫斯對狄奧多修懷有偏見，刻意淡化其戰場表現，於是在註腳

15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n. 117.

15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n. 116.

15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156 Howatson and Chilvers,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p. 575.

15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2.

15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02, n. 6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批評：「卓西莫斯常以瑣碎和不可信的細節，褻瀆最嚴肅的敘事，暴露出判斷力的貧乏。」[159]

吉朋更指出卓西莫斯敘事不精確，犯有不少常識性錯誤。《衰亡史》第 7 章講到兩位戈迪安（Gordians, 237 年 4–7 月在位）皇帝之死，吉朋在註腳指出：卓西莫斯居然說他們是在航海中遇暴風而亡。吉朋將此明顯錯誤，歸咎卓西莫斯「奇特的對歷史的無知，或濫用隱喻」。[160]第 12 章敘述斯基泰人（Scythians）入侵羅馬東境龐塔斯（Pontus），弗羅瑞亞努斯（Florianus, 232–276）率軍征討。吉朋嘲諷：「如果我們相信卓西莫斯，弗羅瑞亞努斯追逐他們遠至博斯普魯斯（Bosphorus）。但是，他幾乎沒時間進行如此長程與困難的遠征。」[161]《衰亡史》第 26 章敘述西元 378 年東帝國皇帝瓦倫斯逝世，將領朱里烏斯（Julius）設計屠殺哥德人青年一事。吉朋批評：「卓西莫斯寫得很仔細和冗長，但弄錯了日期，還努力找理由說明朱里烏斯何以未先奏請皇帝狄奧多修意見。其實，狄奧多修當時尚未登上東帝國帝位呢！」[162]

吉朋雖然對卓西莫斯有不少批評，但在重建史料殘缺的 4 世紀羅馬史時，仍然大量使用《新羅馬史》的敘述，引用多達 314 次。西元 410 年，西哥德王阿拉瑞克進軍羅馬，沿途攻陷重鎮拉文納（Ravenna）。吉朋在第 31 章寫到這裡，說道：

> 在這裡，卓西莫斯的文本業已損毀。我們已失去其第六書的剩餘部分與最後一書。最後一書終結於羅馬的陷落。他雖然失之輕信與偏頗，但我們必須告別這一位史家，內心帶著一些遺憾。[163]

吉朋覺得卓西莫斯雖不是可靠的史家，但只要審慎運用，仍是有用的史源：「恰當的做法是，我們需要卓西莫斯的服務，但毋庸遵奉或信任他。」[164]

15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29, n. 132.
16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79, n. 34.
16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324, n. 18.
16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18, n. 105.
16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321, n. 101.
16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64, n. 7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代史家

在書寫羅馬帝國史過程中，吉朋除了運用古代史家的史源，也倚賴近代古典學者的研究。在近代學者中，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神學家和史家莫斯海姆和法國學者提勒蒙，是吉朋的重要嚮導。吉朋常採用他們的敘事或詮釋，在引證之餘，也對他們作了不少評論。

莫斯海姆主張以客觀和批評的方法考訂一手史料，出版了《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史》(*De rebus christianorum ante Constantinum commentarii*, 1753）與《教會史綱》（*Institutione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Antiquae et Recentioris*, 1755）4 卷。這兩部書，對吉朋來說，是有關早期教會歷史的權威著作。

《衰亡史》第 15 章討論初始教會的發展時，即倚重《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史》一書。吉朋在註腳說：「這一部傑出的著作遠比其《教會史綱》，更能全面探究初始教會的情況。我將常有機會引用這本書。」[165]同一章，吉朋引《教會史綱》討論 2、3 世紀諾斯底派（Gnostics）對猶太教上帝觀的質疑。他在註腳中稱讚莫斯海姆對此課題作了「雖簡潔，卻非常清晰的敘述」。[166]吉朋比較幾位學者對諾斯底派的論述，給予莫斯海姆最高評價:「莫斯海姆富有創見，也很公正；勒克拉克(Jean Le Clerc, 1657–1736）雖然單調乏味，但精確；波梭柏（Isaac de Beausobre, 1659–1738）幾乎總是在為他們辯護；而初始時期的教父們恐怕常都是中傷者。」[167]

吉朋讚賞莫斯海姆常從古代作者遺留的不完整資料，釐出清晰的敘事，《衰亡史》第 15 章即根據《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史》敘述拿撒勒人（Nazarenes）的改變信仰。西元 129 年，皇帝哈德良（Hadrian, 117–138 在位）為懲治猶太人的叛亂，在耶路撒冷的廢墟上興建埃利亞．卡庇托立納（Aelia Capitolina）殖民地，並嚴禁猶太人接近。拿撒勒人為避開

16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8, n. 18.

16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3, n. 29.

16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4, n. 3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禁制，選了外邦人馬可士（Marcus, 134–156 任職）作主教，由他去說服同胞放棄摩西法律。「藉犧牲其習慣與偏好，他們買到進出哈德良殖民地之權利。」[168]吉朋在註腳說：「比較優西比烏斯與塞維魯斯（Sulpicius Severus, c. 363–425）兩種無法令人滿意的敘述，莫斯海姆對此一演變的背景和動機，作非常清晰的陳述。」[169]

莫斯海姆雖然治學嚴謹，但有時也會出現詮釋過度的毛病。《衰亡史》第 16 章寫到西元 303 年 2 月 24 日，戴克里先發布第一道迫害基督教的詔令。吉朋在註腳中談到莫斯海姆如何處理此事：「莫斯海姆從拉克坦休和優西比烏斯的著作，蒐集一些零散、片段文句，對此敕令作公正、精確的說明。雖然他偶會流於臆測和過度詮釋。」[170]莫斯海姆處理 2 世紀初皇帝亞歷山大宗教政策時，出現類似情況。吉朋在第 16 章的註腳批評：「關於亞歷山大宗教政策，莫斯海姆似乎詮釋過度。亞歷山大要為基督興建一座神殿的計畫的說法，除了一份不可能存在的報告外，似乎無其他根據。這個報告是基督教徒構織，而君士坦丁時期史家輕易採信。」[171]

在近代學者中，吉朋引證最頻繁的是法國古史學者提勒蒙。提勒蒙學問淵博、治學勤勉，其《羅馬皇帝史》與《教會史》（*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ers siècles*）是 17 世紀古文物研究的典範。[172]吉朋寫《衰亡史》時，引用這兩部著作達 251 次。

在吉朋眼中，提勒蒙是個勤勉、有耐心的學者，蒐集資料鉅細靡遺，考訂疑難仔細詳盡。對其勤勉與博學，吉朋常不禁讚嘆。《衰亡史》第

16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p. 9–10.

16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0, n. 21. 優西比烏斯是巴勒斯坦凱撒利亞主教，著《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塞維魯斯是 4 世紀後期、5 世紀初高盧亞奎丹基督教作家，有《教會史》（*Chronica*, or *Historia sacra*）傳世。

17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22, n. 153. 拉克坦休是基督教作家，擔任君士坦丁一世宗教顧問，303–311 年間寫有護教著作《神學綱要》（*Institutiones Divinae*）。

17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112, n. 117.

172 有關提勒蒙的信仰與學術，參見 Jordan, “LeNain de Tillemont,” p. 48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1 章敘述聖徒阿撒納修斯（Athanasius, 296–373）事蹟，吉朋抱怨同時代人寫的傳記，或歌功頌德，或考究不實。幸好，提勒蒙的《早期教會史》作詳盡考訂。吉朋在註腳說：「提勒蒙和本篤會的編修者，努力收集每一件事實，考訂每一項疑難。」[173]《衰亡史》第 32 章敘述安提阿聖徒克里梭斯通的行止，吉朋比較幾本傳記，同樣在註腳中讚揚，提勒蒙《教會史》以「難以置信的耐心與宗教的精確，纂集了聖徒們的傳記」，「鉅細靡遺地搜考克里梭斯通卷帙浩繁的著作」。[174]在第 27 章，吉朋甚至把提勒蒙比喻作一個盡職的「清道夫」：「將教父們遺留下的細碎殘渣，全部耙攏在一塊，真是個有用的清道夫！」[175]

提勒蒙治學嚴謹又扎實，學術判斷可以信賴，吉朋每遇到疑難，常可從提勒蒙的著作得到協助。西元 372 年，北非的羅馬摩爾屬邦發生內爭，費爾穆斯（Firmus, d. 375）弒殺其兄，羅馬政府前往調查，費爾穆斯起而反叛。《衰亡史》第 25 章在撰寫此段時遇到年代模糊的問題：「阿米亞努斯的年代鬆散、不清，歐羅修斯似乎將費爾穆斯的反叛定在瓦倫廷尼安與瓦倫斯死後。」所幸，提勒蒙的《羅馬皇帝史》釐清了問題。吉朋在註腳說：「提勒蒙在《羅馬皇帝史》中小心翼翼，穩步前進。這一頭有耐性、腳踏實地的驢子，即便在阿爾卑斯山最滑溜的步道上，也可以被信賴。」[176]這是一個絕妙的比喻：提勒蒙猶如一頭辛勤的驢子，默默地搜羅資料，論斷都有扎實證據作基礎，即便是最「滑溜」的問題，其見解都安穩可靠。提勒蒙因其博學與精確，遂成為吉朋最可靠的「嚮導」（Guide）。

然而，博學、嚴謹如提勒蒙者，也有馬失前蹄的狀況。《衰亡史》

17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p. 361–362, n. 97.

17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374, n. 41.

175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53, n. 52.

176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48, n. 126. “Tillemont (Hist. des Emp. tom. v. p. 691) endeavours to pick his way. The patient and sure-footed mule of the Alps may be trusted in the most slippery path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 6 章談到皇帝塞維魯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 在位）沉迷魔法、釋夢和占星術。塞維魯斯擔任高盧總督時，髮妻芙絲蒂娜過世。他思念亡妻，故經常夢到她。[177]狄翁在《羅馬史》中有段敘事：西元 186 年，這位皇后幫塞維魯斯和茱莉雅（Julia, c. 160–217）牽線，讓他們結婚。提勒蒙在《羅馬皇帝史》對這段敘述感到迷惑：芙絲蒂娜不是在 175 年就逝世了嗎？如何能替塞維魯斯的二婚牽線？讀到這裡，吉朋揶揄提勒蒙：「狄翁敘述的並非真實事實，而是塞維魯斯的一場夢；夢境不會有時空限制。難道提勒蒙想像婚禮是在羅馬維納斯神殿圓房？」[178]

提勒蒙也是一個虔信的羅馬教會信徒，常不掩飾個人宗教偏見，連學術判斷都受影響。《衰亡史》第 24 章敘述西元 363 年 5 月皇帝朱里安親征亞述，吉朋指出有關此事，阿米亞努斯、李班紐斯、卓西莫斯和納濟安真等人都有詳盡敘述。但是當他翻閱提勒蒙的《羅馬皇帝史》，卻發現這位史家僅「虔敬地照抄納濟安真這位聖徒對此一軍事行動的批評」，於是忍不住諷刺提勒蒙出於宗教偏見而獨鍾納濟安真，簡直是其「忠誠的奴隸」！[179]

提勒蒙對「異教」或「異端」抱持強烈敵意，影響對史料的選擇或詮釋。西元 364 年，瓦倫廷尼安（Valentinian, 364–375 在位）下詔，鼓勵朱里安改教時受迫害者出面揭發前朝官員作為。《衰亡史》第 25 章指出，當時無人出面指控東方行政長官撒魯斯特，證明其廉正無瑕。吉朋在註腳批評提勒蒙：「儘管佐納拉斯、蘇伊達斯和《巴斯裘年鑑》（*Paschal Chronicle*）提供了證據，提勒蒙意欲不想相信這些故事，因其對異教徒如此有利（*si advantageuses a un payen*）。」[180]第 29 章敘述達西安（Flavius Eutolmius Tatianus, fl. 357–392）與普羅庫魯斯（Proclus Lycius, 412–485）

177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49.

178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1, p. 149, n. 68.

179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99, n. 60. “The military criticisms of the saint are devoutly copied by Tillemont, his faithful slave.”

18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0, n. 3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父子臨危授命，出掌君士坦丁堡。權臣魯非努斯忌之，誣指其腐敗與豪奪，橫加迫害。吉朋發現史家對此事看法不一：古代史家卓西莫斯「確信他們無辜」，而近代史家提勒蒙則「相信他犯每一項罪行」。吉朋在註腳中論其曲直：「卓西莫斯敘述達西安與其子的失勢，確信他們無辜，其證言比敵人之指控更有分量。西元 373 年，達西安擔任埃及長官時與亞略派（Arianism）有過從，致使提勒蒙相信他犯每項罪行。」[181]吉朋認為提勒蒙是虔信的天主教徒，出於宗教偏見，而認定屬於異端派的達西安父子必然犯罪。

相對的，提勒蒙對羅馬教會的一切則曲意維護。《衰亡史》第 27 章提到蘇佐門和狄歐多瑞（c. 399–458/466）說埃孔尼姆主教安姆費羅丘（Amphilochius of Iconium, ca. 339/340– 394–403）是一個「偏鄉的主教」。提勒蒙批評兩位史家的「鄉下主教」和「偏僻城市」說，貶低了安姆費羅丘主教和埃孔尼姆城。不過，吉朋支持史家說法，在註腳指出：「我必須冒昧地說，安姆費羅丘和埃孔尼姆在羅馬帝國內確實均非太大標的。」[182]提勒蒙對基督教聖徒的作為，更不惜隱惡揚善。《衰亡史》第 235 章述及基督教神學家西瑞爾（St. Cyril of Alexandria, c. 375–444）信仰上的投機，在註腳中歷數其見風轉舵：他宣布放棄正統神職，改由亞略派重新授職；之後隨時代風向轉舵，精明地改宗羅馬教會。但提勒蒙在《教會史》中卻「以體貼與敬意」，處理西瑞爾的事蹟。吉朋在註腳中諷刺說：「他在正文中闡發他的美德，卻將他的錯誤丟進註腳裡，並且體面的隱匿在書的卷末。」[183]

18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18, n. 6.

182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142, n. 23.

183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2, p. 456, n. 70. “Tillemont (Mém. Ecclés. tom. viii.), who treats his memory with tenderness and respect, has thrown his virtues into the text, and his faults into the notes, in decent obscurity, at the end of the volum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19 世紀史學革命以來，歷史研究走向「專業化」或「現代化」。現代史學有三項可資辨識的特徵。其一，區別「原始史料」與「二手資料」。在現代史學中，前者提供可靠的史實或證據，後者則提供適當論證或解釋。[184]現代史家引原始證據以確保研究內容的新穎，參考二手資料以避免格式或論題過於陳舊。[185]其二、文本或史料解讀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當代史學主張史家須先對古代社會整體進行重建，再在此脈絡解讀古人的思想和行動。[186]文本的產生有其特定脈絡，唯有回歸此一脈絡，文本才能被完整解讀。[187]其三，系統性使用「註腳」，以示論證或敘事的可靠性。古典時代以來，史家基本上認為讀者應相信史家的誠信，書寫歷史時大都不覺得有必要交代資料依據或出處。[188]現代史學主張史學應如科學般可以驗證，乃有系統地以「註腳」交代引據來源，證明史家的信用。「註腳」，誠如史家安東尼．葛拉夫頓（Anthony Grafton）所說，將「現代史學」從「傳統史學」中區別出來，成為現代史學的重要識別標誌。[189]

今日，「註腳」已成為史學的必要裝置。學生一踏進史學行業，就開始學習製作、使用符合格式的註腳。從學徒訓練到成為獨立作業的成

184 Arno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s,”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 2.

185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186 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187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 no. 1 (1969, Middletown), pp. 3–53.

188 Arno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42–43.

189 Grafton, *The Footnote*, pp. 23–2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熟史家，在漫長的養成過程中，製作註腳逐漸成為一種習慣，甚至內化為「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現代歷史家對註腳有一種執迷，幾乎到無註腳即不成文的地步。

現代史學主張研究「問題」，而不是書寫「時代」。在這種風氣下，專題研究取代通史寫作，成為史家的主要書寫類型。在專題研究中，議題的形塑、史料的討論、論證的進行等，基本上是在正文中進行，註腳的功能大都僅在標示引證資料的出處，以示學術信用。現代史學論著的註腳絕大多數屬於「短註」，內容大都僅包含作者、書名或論文名、出版時地、頁數等基本資訊，很少有其他引人矚目的訊息。這種形式的註腳比較枯燥、單調，從中無法找到閱讀樂趣，通常只有史學同行有興趣瀏覽，從中獲取一些有用的專業學術訊息。

相對地，吉朋的《衰亡史》在註腳運用上呈完全不同景象。《衰亡史》寫於 1770 年代與 1780 年代，當史學尚未經歷專業化轉型時。18 世紀歐洲的歷史書寫，正處在從人文主義史學到現代專業史學的過渡期，吉朋《衰亡史》是這一過渡期史學的傑作。歐洲人文主義史學的主流是書寫「時代」，亦即通史性質的連續性敘事。吉朋的《衰亡史》延續此一書寫傳統，寫的是從西元 180 年到 1453 年兩個羅馬帝國的衰亡史。人文主義史學主張「真實」、「訓誡」與「修辭」三位一體，但偶爾會配合修辭之需而犧牲「真實」。吉朋比人文主義史家更重視「真實」，認為敘事務求「精確」。為證明自己敘事精確，他使用大量註腳註明引據出處，甚至引錄原文。這一點是人文主義史家前所未見，更趨近現代史學精神者。文字表述上，吉朋與人文主義史家一樣重視「修辭」，但其間也有差異。人文主義史家著重文字的雄辯，史書要能說服讀者接受其道德訓誡；吉朋則淡化史書訓誡功能，主張發揮「寓教於樂」效用。吉朋的《衰亡史》力求敘事「通達」與「文雅」，要能夠適合擺進淑女的梳妝間。通史性質的敘事，正文必須考量敘事連續性，無法容納所有歷史細節，只好丟進註腳中處理。同樣，吉朋因重視正文敘事的文雅，也常須把一些突兀的敘事，隱藏在註腳裡。在註腳使用上，《衰亡史》比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一般現代史學論著要多元、豐富、有趣得多。

吉朋在《衰亡史》中大量使用「註腳」，把註腳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除了基本的徵信功能，他也在註腳說明資料選擇原則、史料處理方式或進行考訂與論證。有些情境不便在正文表述，就選擇在註腳中揭露，兼顧歷史真實與敘事的文雅。他也利用註腳與古人對話，與近人論辯，作今古比較，展現其許多歷史思維。此外，《衰亡史》的註腳文字活潑，常自由發揮，讀起來饒富趣味。《衰亡史》第 30 章敘述西元 406 年哥德人入侵義大利，西帝國支柱史提利科發揮軍事才華，擊潰哥德人，再一次挽救帝國。這是霍諾留斯在位期間值得大書特書的成就，但宮廷詩人克勞狄安居然保持沉默。吉朋禁不住在註腳中挖苦一番：「克勞狄安的謬思，她睡著了嗎？她沒有得到好酬報嗎？我想，霍諾留斯的第七年執政任期，可提供一首高貴詩歌的主題。」[190]《衰亡史》的註腳內容之豐富，運用之巧妙，史家少有能出其右者。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190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vol. 3, p. 267, n. 85. “And Claudian’s muse, was she asleep? had she been ill-paid? Methinks the seventh consulship of Honorius (A.D. 407) would have furnished the subject of a noble poem.”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塔西佗著，馬雍、傅正元譯，《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Gibbon, Edward.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Gibbon, Edwar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 1764.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6. London: Methuen & Co, 1905–1906.

Gibbon, Edward.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Vol. 2. London: John Murry, 1814.

Hume, David.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Vol. 2. Edited by J. Y. T. Grei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Libanius. *Libanius Selected Orations* vol.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 F. Nor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Moyriac de Mailla, Joseph-Anne-Marie de.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Paris: P.-D. Pierres and Clousier, 1777–1785.

Ovid. *The Art of Love and Other Poems*. Translated by G. P. Good and J. H. Morz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aterculus, Velleius.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The Res Gestae of Augustus).* T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 Ship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vol. II: books 3–4. (The Vandalic War)* Translated by H. B. 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二、近人研究

楊肅献，〈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119–180。

Black, Robert. “Benedetto Accol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6, no. 378 (January 1981, Oxford), pp. 36–58.

Bowersock, G. W. “The Art of the Footnote.” *The American Scholar* 53, no. 1 (Winter 1984, Washington, DC), pp. 54–62.

Grafton, Anthony.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watson, M. C., and Ian Chilvers, eds.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rdan, David P. “LeNain de Tillemont: Gibbon’s ‘sure-footed mule’.” *Church History* 39, no.4 (December 1970, New Haven), pp. 483–502.

Jordan, David P.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Low, D. M. *Edward Gibbon, 1737–1794*.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7.

Low, D. M. ed. *Gibbon’s Journal. To January 28th,1763*. New York: W. W. Norton, 1929.

Machin, I. W. J.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no. 57 (January 1939, Oxford), pp. 84–88.

Momigliano, Arno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s.” 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p. 1–39.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Momigliano, Arnold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almeri, Frank. “The Satiric Footnotes of Swift and Gibb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1, no. 3 (Autumn 1990, Philadelphia), pp. 245–262.

Pocock, J. G. A.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kinner, Quenti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 no. 1 (1969, Middletown), pp. 3–53.

Young, G. M. *Gibb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4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2 (Dec. 2023), pp.235–29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12_(72).0004

Edward Gibbon's Art of the Footnote

Yang, Su-Hs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se Edward Gibbon made of footnotes in his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focusing on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the works, with a view to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that lies behind his composition of the Roman history. There are nearly 8,000 footnotes in the *History*, which represent, in terms of words, around a quarter of its contents. Gibbon was a great master of the art of the footnote and the manifold and masterly ways in which he composed them contribute not only to evincing the credentials, but also to highlighting the art, of his narratio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the Roman Empire.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function of proving his credentials as an historian, Gibbon had, in his footnotes, explained his principle of selecting sources, his ways of using materials and the criticism he made on them when necessary. Moreover, in the age of politeness, contents considered not proper to appear in the main texts, Gibbon would choose to hide them in the footnotes instead, so that historical truth and the decency of writings could both be attended to. Gibbon also often used footnotes to have dialogues with the ancient authors he had cited and to

*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319, Taiwan (R.O.C.);
E-mail: yangsh@nt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rgue against the modern historians he disagreed with. It amounts to a sort of table-talk which would enliven Gibbon's narratio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Keywords: Edward Gibbon, footnot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8th century, historical writing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